

野百合通訊

三月學運三週年
第三期



一九九三年三月・壓迫正在進行中……

目錄

〈三月〉

三月學運座談會記實		2
學運討論之一：三月學運	霧月十八弄政經小組	22
全學聯大事記	許銘全	24

〈學運現場〉

校園短波		28
台陽煤礦血淚抗爭記實	高偉凱	30
運動與生活的結合		32
阮大年的第一場仗	陳政亮	33

〈歸零：準備射擊〉

1993年三月台灣政經筆記	徐光南	38
諸神還在外太空	楊添圍	40
大學社區運動：校園運動長期經營的 進一步思考	陳柏偉、周倩而、顧家銘	41
有人問我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林致平	43

〈編輯手記〉		49
--------	--	----

1992年11月12日創刊・1993年3月22日本期出刊

編輯委員：王時思、史哲、何東洪、沈發惠、林致平、邱花妹、邱毓斌、周奕成、侯念祖、郭紀舟、陳尚志、陳政亮、黃泰山、黃新高、楊添圍、劉茂彬、蔡其昌、蕭武昌（編委持續加盟中）

本期美編：羅丹與小魚兒 聯絡地址：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25巷2弄28號

TEL/FAX：(04)6321740 郵撥帳號：21190623 劉茂彬 贊助訂價：四十元以上

三 三 月

那些從桌上拿走食物的人

鼓吹知足

那些吃飽的人對飢餓的人說

美好的時代就要來臨

那些領導國家走入深淵的人

高呼統治平凡人太困難

～布雷希特，1937



三月學運座談會記實

時間：1993年2月20日午後
地點：羅斯福路人性空間
發言人員：丁勇言、江斐琪、何東洪、李威霆、林致平、郭紀舟、曾若愚（以上曾任廣場決策小組）、邱毓斌（廣場糾察隊隊長）、邱花妹、陳尚志、陳政亮
聽眾：林淑貞、許銘全、李宜恭、高偉凱、夏樂祥、沈發惠、高國峰、小妹……
主持：楊添圍 整理：呂明洲

題綱

- 一：三月學運對憲政改革的意義及其定位。
- 二：從三月學運談學運團體的校際串聯與全島運作。
- 三：從三月學運談學運與社運的結盟關係。
- 四：對三月學運後學運發展的看法與展望。

在決策小組成員之一鄭文燦以「我現在是政治人，不適合參加學生活動」的理由缺席下，我們開始討論。一開始大夥就對討論的題綱有著各個不同的想法，然而也經過這樣的討論，對三月學運種種不同的理解觀點也陸陸續續出籠。由於場外仍有其他使用者，使得大家不得不在有些吵雜而干擾的環境下，頗為吃力地陳述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場景倒和學運的現狀不禁讓人引發一些聯想。或許任何座談和討論原本就不可能統合出大家一致的看法，而正因為如此，三月學運的意義保持開放，並且不斷地在創造之中……

三月學運之後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在塑造三月學運的意義

添圍：先講一下今天開座談會的目的。因為第三期預定在野百合三週年的時候出刊。這次座談主要是請三月學運最後一次的決策小組成員參與，主要是回顧三年前的一些事情，討論一下大家的意見和感想。另外有些現在負責學運的主力幹部在場，也請他們儘量提出意見。第一個題綱是討論三月學運的歷史定位和其意義。題目是比較抽象，就是三月學運是促成憲改的一個蠻重要的事件，不管它的功過與否，它跟目前進行三年多的憲政改革應該有蠻多相關的，希望大家談一下這幾年來最大的一次學運事件，從國會全面改選到最近等等包括兩黨政治的一些問題，請大家提出看法。

若愚：老實說，我對三月學運的記憶非常模糊。昨天翻了一下以前的文件和紀錄，整個事件給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們的撤退聲明，也就是三月學運最後一份文件的那個標題：「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我不知道現在的學弟妹怎麼樣去理解這樣的事情，在文化和學弟妹談起這些事，焦點都擺在較小的部份。如果談到三月學運的意義，對我個人而言，開玩笑地說，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三月學運完後，我是光榮回家。在當時這也反映了大家對三月學運的評價。可是這幾個月來，聽到一些不同的看法：三月學運根本就是被李登輝收編的東西。這種轉變讓我想到，我們談三月學運不能只談三月學運對我們而言有何意義，我相信三月學運的意義本身是在改變當中。三月學運之後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其實就是在塑造三月學運的意義。可是我覺得說，我們這樣做都對不起我們撤退時的精神，那份文件的精神是強調要把野百合的精神帶回學校去播種，但是這三年來的校園狀況，實在很難對自己有個交待。我相信我們在談三月學運的意義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就是我們希望三月學運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我們在談的時候，不應只是看到三月學運

發生的事情，而也應該反省到我們希望它發揮到什麼作用。如果我們希望三月學運成為什麼樣子，而我們塑造它成為什麼樣子，那就是我們希望三月學運也有什麼樣的意義。我不希望只將它看成三年前的獨立事件，將它當作一個和我們無關的事件去解釋它，而是將它擺進三年來我們實踐的脈絡中，回過頭來去理解它。

威霆：我想把問題釐清一下，第一個是產生在對意義和定位的看法，我想區分成幾個：一種是從效果來看，比如說三月學運的成果是被誰收編的，在高層的政治權力鬥爭過程當中，對誰有利對誰不利，被誰當作籌碼來用，這是從運動的效果上來講的。然而對於一個運動的參與者，是不是只能從它的效果上來談它的意義和定位？事實上不然。對於一個運動主體而言，我們要怎麼樣定位？我覺得定位是人找出來的，幫自己定位的。第二個是：剛剛若愚所談的「民主」，這部份我先談一下，我覺得這好像把問題搞混了，我們原先所談的是對黨政改革的意義，那如果要就民主來談的話，事實上憲章運動跟權力派，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普選運動也一種民主運動，三月學運是否要把它界定成一種民主運動，恐怕是第二個問題。我想把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革底下談可能已經不很恰當，現在又把它擺在「民主運動」底下，更會使討論變得更分歧。

另外，我想提出的是：下面這種觀點是有部份的道理，就是說一件事情的意義，可以從事後我們對它作了什麼來闡述它的意義。意義始終在不同的脈絡之下才有它的意義，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必需看是對什麼而言的意義。如果按照題綱所設計的，是要把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革底下談，那它的意義就不是我們在事後可以扭曲的，也許有人覺得三月學運就像一團雲霧一樣發散掉了，但是三月學運的意義是否就是這樣而已？恐怕就不止。

紀舟：大家在爭論三月學運的意義和定位如何

理解？意義的意思是什麼？那為什麼不直接把意義本身講出來就好。對於三月學運的意義和定位，在座的各位一定有爭執，就直接把每個人的想法講出來就好。

我個人對三月學運的看法，從學生運動本身的發展來看，三月學運它是個政治議題，剛好四大訴求都集中在政治的部份。而三月學運前學運比較關心社會議題。三月學運發生後，學生被迫要面對政治層面的鬥爭。由於KMT高層黨派嚴重內鬥，使學生的介入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是隨著往後政治空間愈來愈緊縮，政治資源被各黨派瓜分愈來愈明顯，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這逼使往後的學生運動，必需靠邊，必需要面對你要對抗的到底是誰，是主流派還是非主流派。回到學運的發展狀況來談，我會覺得政治的黨派色彩愈來愈清楚，逼得現在各黨派團體都必需表態，但是我認為現在的學運是不願意或者沒辦法表態，然而就是愈來愈萎縮下去。

從訴求從效果而言

三月學運基本上是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事件

尚志：我實在沒想到，三年來沒有談這個問題，大家講起話來這麼玄。我覺得分政治議題，還是社會議題，其實是一個很不明確的講法。因為所有的政治議題，它就是經濟、社會議題。那回過頭來看三月學運的時候。我會覺得三月學運的歷史效果，或者什麼事件的歷史效果，並不會完全如我們在做的時候所想的那樣。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在做什麼，可是實際可能走的是相反的方向。那我從這一點切入來談是要說，先來看它的歷史效果是什麼，我認為三月學運是台灣政經轉型下所產生的一個重要事件。台灣自從80年代就開始進入所謂自由化的過程，在這個自由化的過程裡面，它開始激盪出民主化的想法，到了1990年3月，民主化已經成為社會上的共識。但是當社會上形成民主化的共識時，台灣政治上的各黨各派卻都喪失了改革的正當性和代表性，而學生剛好有了促使政治

民主化和政權轉型的正常性力量，三月學運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我們再看四大訴求。事實上當我們到廣場去的時候，四大訴求都已底定了。第一條，廢除國民大會，就是廢除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民意機關。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它的意義是



●三月學運前學生運動關心社會議題，三月學運後學生被迫面臨政治議題

要求台灣進入一個正常的憲政或民主國家。那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我們不要忘記，原本的訴求是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基本上是一個要求民主化的訴求。之所以後來會改成政經改革時間表，這是要求運動往前進一步所提出的想法，但是從效果上來看，它並沒有達成預定的效果。召開國是會議這個訴求，根本只是在替三月學運找一個下台階。從訴求，從效果來看，三月學運基本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事件。

紀舟：從理論分析而言，當然無法劃分什麼是政治，什麼是社會議題。我剛剛會這麼說基本上是從學生運動能選擇的層面而言。在實踐上來說，原本大部份的學運，關心的是社會層面的議題，而三月學運後被迫要面對政治層面的議題，這是不一樣的。

三月學運帶來了很多可能性 要評估的是為什麼事情的發展不如所願

致平：下面談的個人想法是被大家激發出來的，剛剛大家的釐清的作用蠻好的。釐清的結果是所有的問題都很紛亂。對我來說，今天在談這個問題，第一個感觸是說：當時觸動三月學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萬年老表的現象。今天都已被結束，所有的國會都已經是新的國會的時候。當這個制度上的缺失都被補足的時候，那三月學運的意義到底在那裡？這對學運來說或者甚至對外來講都是十分重要的現象。這是必需回答的問題。那第二部份是說，對於一個運動的成敗，定位或者意義的態度。我贊成威靈的想法。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是事實上成敗的問題。另一個是對運動者，運動中的群眾這些主動者的意義的問題。論成敗問題，我們還是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談：有一種方式是看你當時提出什麼，後來做到什麼來論，這是一種最粗糙的方式。老實說，在跟人鬥爭時，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方式。可是還有一個意義，可以從是否按照原先所提出的想法來發展，來論成敗。可是就忽略了今天我們在進

行的是一種群眾運動。運動本來就不是依所設計的來達成的東西。所以我比較傾向說，運動在當時的脈絡下它帶來多少的可能性，如果都這個觀點來看三月學運的話，跟先從三月學運的結果論成敗比較起來，心裡的感受是差別很大的。在當時的脈絡底下，將四大訴求翻開來看，如果不去預設未來的發展怎樣，在任何的歷史關卡，包括KMT都有很多選擇。我知道就當時的國是會議籌備小組，在解決國會問題上，光法治的解決方案就有5種，從最保守到他們所謂最激進的，會引起黨內分裂的方案。三月學運所喊出的訴求，好比說廢國大，廢臨時條款，擺在當時的脈絡，可以看出三月學運它啓發出多少可能性。當國大一廢，本來就會產生出制憲與否的問題，就會產生出一個國家主權對內而言是否合乎民意這樣的問題，那從最差最差的人選的問題，到最激進的是否要重新建立一個國家制度，這些都是可能的。那若我們從這邊來看，當然我們要附加評估的是，為什麼事情的發展為什麼不如所願，為什麼那麼多的可能性會一個一個被消滅，這是一個比較能夠誠實地對我們到底做了那些事情的看法。

那另一方面，還存在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從什麼角度去看，或者說承認那些是做為我們的分析觀點。就好比說紀舟剛剛所提到的政治或社會問題，從分析的角度當然可以說，任何問題都是政經問題。可是你若是從你所從事的鬥爭的議題來講，談政治、經濟、社會這樣的分法，還是有一些意義的，那就不是從那個觀點去分析的問題。如果要談用什麼樣的觀點去分析，我們可以選擇，比如說從KMT高層內鬥的角度去分析，也可以像威靈說新舊世代交替的角度去談。當然還有其他的，可以把它看成政治和經濟的不同作用；然而你也可以說政治的作用總是立即而明顯；也可以說經濟的力量怎麼樣一點一滴在起作用。這些都是可以的。不過，在這種種分析方式裡面，為什麼威靈會挑到世代交替

的方法？是因為它是一個現在的新鮮名詞？還是可以由此談出一些新的東西來？

尚志：首先，運動沒有所謂的成敗問題，我在意的是看事情的方法，以及回過頭去談三年前的事件時，重要的是：我們在當中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和得到什麼樣的結討？重要的不是我們現在如何去整理它，而是看說，當初我們提出了什麼，怎樣做。如果總體的趨勢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我們很可能會遭到挫敗。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社會力量衝激作用的方向並不是如我們想像的那樣。

致平：好像一陣子沒見到尚志，尚志變蠻「歷史決定論」的。剛剛聽到的所謂「自由化的進程」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是說台灣整體的方向是在進行一種叫做「自由化」的東西呢？還是說在政治上變革？

威靈：我補充一下，剛剛有提到一個名詞「民主化」，就民主運動本身來講，歷史上進行徹底的民主化運動，恐怕是英國19世紀的「憲章派」運動。可是問題是說，在「民主」這麼崇高偉大的觀念之下，每個人心裡頭到底想的是什麼？這個角度來談，這也是我反對從「民主化」這個抽象的概念來談的原因，因為民主化始終是一個談不清楚的東西，事實上民主只是保證每個人有普遍的參與權外，好像並沒有保證其他東西，如果從這個比較空洞的概念來討論，恐怕是談不出什麼。

另外一個是關於政治、社會、經濟這幾個不同的議題，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一種說法是：他們覺得政治運動一方面同時也是階級運動，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盧格正好在爭論這個問題，「政治運動是否是階級運動，或者階級運動是不是政治運動？」這樣的問題在現在未必是適合的，但是可以啓發的是台灣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如果我們把社會運動的定義放寬一點，而當我們說政治運動就是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同時就是政治運動，這種說法到底意味著什麼？當然這個問題

涉及到一些爭論，比如說政運社會化，社運政治化等等的。如果這樣要繼續談的話，會碰到每個人對於運動的定義就不一樣。事實上在這個題綱裡面，我們也可顛倒過來看，我們不僅可以談三月學運對憲政改革有什麼樣的意義？我們也可以談當時的憲政改革對三月學運有什麼意義？但是始終涉及到底是用什麼樣的觀點去看。比如說當理想地認為政治運動同時就是一種社會運動，那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是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我認為三月學運並不純然是一個政治運動，當然這裡又涉及到「政治」究竟是什麼意涵？談到什麼是政治呢？不外乎包括人的實踐空間或者倫理的空間等等之類的。這樣的定義並不是現在我們所熟悉的政治的定義，現在政治的定義被狹隘地歸納到兩個領域內，一個是國家機器運作的領域，一個是權力分配的領域，如果就這樣來談的話，三月學運都不是屬於其中任何一者，我們在三月學運裡，看到許多新的變化和組合出現，比方說：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也投入這個運動，在裡面也造成許多衝激和改變。所以如果就權力分配和國家機器運作資源的分配而言，似乎都沒有辦法很好地將三月運動擺在這樣的脈絡底下來談。那是不是說，三月學運在這裡已經有一些改變，比方說：並不能單單就簡單的階級劃分、或者外省人和本省人這樣的劃分來看待三月學運，是不是它提供未來運動發展的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我比較原初的想法。

尚志：我要澄清幾點：我剛剛談的「自由化」，是說反對國家加諸在個人人身的限制，包括言論上的，行動上的。同時也反對國家加諸于市場的種種限制，這些限制如果解除了就是所謂自由化。那「民主化」就更簡單了，我剛剛講的民主化是指代議民主制的確立。那另外一點是，在三月學運中，每個人都在創造一些東西，而當這些力量匯整後，可能它的方向會變得不一樣。我不是從歷史的結果回過頭來批評當時我們的作法的對錯，而



●1990年三月在野勢力加上學運，
終使國民黨剷除它最封建的部份

是要強調，當時我們怎麼想的，怎麼做的，而現在的整體結果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些差距是怎麼來的？這樣的檢討對於未來搞運動時，會有很大的幫。

致平：我剛剛提到自由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要談的是一種趨勢，那要說明這個趨勢有那些特徵。如果要談的是一種制度上的變革，那我們就要詳細地從制度來看。剛剛尚志所說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化”，很多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地下化”。那這個地下化和自由化我們要怎麼談？我想問的是說的“自由化”，不管是政治上的自由，還是經濟上的自由，是不是從古典的自由主義的觀點來談的？因現在這樣的時空，令人想起18世紀自由主義的種種現象，這樣的類比會產生危險。

三月學運促成了國會必須全面改選 小資產階級也在新的國會中找到出路

勇言：我覺得剛剛的討論十分有趣，愈討論名詞愈多。同時焦點也並不完全一致。好像有人在說，三月學運是怎麼產生的？或者是說當然的背景，怎麼樣逼出學生到中正廟？然後逐漸卻變成在政治學上的討論，和一些名詞的定義上。也許我們可以用更白話，更具體的例子來說。我是這麼看的：在1990年的台灣社會需要更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去呼應當時逐漸成型的小資產階級或者是中小企業老闆，所以原先極少數作為本土財團的民意代表不夠用了。這樣的情況並不符合當時需要更成型的代議民主的好處的這些人的利益。比如說某一些商人，希望國家解除某一制度，可能是經濟部所主管的，但當他沒有管道去申訴的時候，同時如果資本額不夠大，大到可以去影響國家的重大政策的時候，他們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所以國會全面的：“啊！這要民主了”。然後，在這過程中就逐漸凝集成共識，我們就是需要這個。而當時學生去中正廟時，可能不是這麼想的，學生可能追求的是民主這種抽象的價值或理

想，而社會上想的可能是十分實際，他們要的是透過國會全面改選來實現他們的利益。至於像運動者的主觀認為：希望運動方向往那邊走，甚至希望提出一套更進步的政治體制來代替。所以我們會在訴求裡面的一兩個民主”改成“政經”，看看他結果會不會不一樣，我們希望政經改革時間表提出時，能和國民黨高層抗爭像核四，五輕這樣的重大經濟建設，我們希望在訴求上的這樣的牽連，能增加我們跟KMT高層對話的籌碼。然而這樣的期望也許跟當時支持三月學運的學生和群眾的想法並不一致。所以這樣的訴求就不會被重視或者不會被進一步地推展。然後我們再反過頭來看其他的部份，在民主化的議題，像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有關懲治叛亂條例，刑法一百條的問題在隔一年就會被處理並且解決。雖然在當時三月學運的訴求內這二條例的廢除並未被提出，但是因為它們的存在跟當時的民主化進程衝突，所以運動的空間被出來了，而我們希望的在經濟重大建設的發言權就無法浮出檯面來。所以要談的是，當時除了學生以外的社會群眾基礎，跟主觀地想要去推動的方向的衝突是什麼？然後在今天國會已全面改選後所撐出來的政治空間是誰在掌握的？這樣理解就更清楚了，所以與其去爭論一些名詞和定義，不如拉回來看三月學運完後，三年來的台灣，和現在的台灣有什麼不同？而我們當時所提出的訴求，在後來是被那些集團使用，以及怎麼樣使用的？也許這樣會更清楚一點。

尚志：所謂台灣在90年代左右轉型的動力是什麼？剛剛談到的小資產階級的興起這種經濟因素，我覺得可能不夠。

勇言：當然也有舊的權力系統瓦解的原因。所以這次的轉型才會在1990開始，而不會在80，或70開始。當然在這個時候差不多也是本土的小企業主累積到一定的財富，而逐漸形成他們必需和政治力相結合的經濟條件。

紀舟：這個講法蠻有趣的，三月學運變成一個

替小資產階級開拓政治空間的運動。

勇言：我是說三月學運促成了國會必須要全面改選，同時新的小資產階級也替自己在未來新的國會中找到出路。

毓斌：如果說三月學運替資產階級找到了新的政治空間，這我同意，而若是小資產階級，我保留。

毓斌：剛剛斐琪私下跟我說，為什麼大家在談三月學運的意義時，不談對學生運動本身的意義或影響？當我拿到這份題綱時，我有點納悶，為什麼只談三月學運對憲政改革的意義，彷彿三月學運僅留下推動後來憲政改革的作用？那來看看所謂“憲政改革”是什麼？當時所達到的實質效果，事實上只有召開國事會議而已，國是會議開完所在進行的也不是憲政改革的工作，事實上只是KMT將原先束縛自己的包縛拿掉而已。我想來想去，在憲政改革上的意義似乎只有這些囉！頂多我們只是把老表廢掉，後來的省市民選、總統直選，其實對國民黨也不會形成什麼挑戰，甚至對KMT而言是有好處的。如果要拿名詞來包裝對憲政改革的意義，就像尚志說的那樣而已。

我比較會想談的，或者這幾年來思考的結果，想要反省的是三月學運對學生運動產生的意義。我覺得若愚剛剛有個講法很有趣。要談三月學運的意義要結合著學生後來怎麼發展。就是它的意義跟後來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這些關聯包括細到後來野百合像不見了時學生的態度大到全學聯的政治、外交關係等。我覺得這些都足以影響我們今天來談三月學運的意義。當然同時也要評估外界對三月學運的看法。在那時學生群眾一下膨脹那麼快，也有人提出“學運元年”等，但是當時在那樣的情境下，我們怎麼去評估，思考我們的未來，從現在來看，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我們當初認為三月學運的意義和現在的差別在那裡？大家給點建議吧！

勇言：毓斌剛剛提出的問題，不是大家不重視，而且在剛才的脈絡下無法談。我還是先澄

清剛才我所談的：從今天的效果上看，為什麼三月學運替小資產階級開拓了政治空間。在國會全面改選之前，台灣的小資產階級頂多能接觸到的是那時的省議員或縣議員，然而他們一遇到關於國家的重大政策時，他們找不到代言人，國會全面改選後那麼多席次的立法委員，事實上是小資產階級搶奪的實力。現在的國會會逐漸關心一些較小的議題：比如說：獎勵投資條例，某種人員的任用資格，或者開放某一些商品，甚至赴大陸投有那些條件，開放那些商品進口，等等，這本土大資產階級所原本享有而較不關心的部份，就由他們的代言人提出來，這就是我所談的政治空間在這裡。而過去的舊國會來講，根本沒有這個條件。

斐琪：小資產階級（中小企業主）的政治空間是三月學運創造出來的嗎？

威靈：坦白說，我個人和我幾個朋友參加三月學運時和到今天對一些問題的想法都還不是十分清楚，事實上當時的環境對我們來講有一種無力感，當時的情況非常惡劣，連DPP都快搞不下去，如果沒有搞一個學運出來的話，如果沒有人先去那邊的話，我也不會自己先跑過去，然後我就無力到極點，反正DPP也不行了。但是當我去的時候，我並不那麼清楚我自己要什麼，事後我發覺自己膨脹非常劇烈，充滿一些幻想，好像學生能做什麼，想得太多了。事實上當時，很簡單的訴求，比如說：廢除臨時條款，廢除國民大會，我自己覺得，如果能夠達到的話，我也很爽，但是爽完後問我滿不滿意，我一定會說我還不滿意，可是為什麼不滿意，我當時還沒想那麼清楚。也是因這樣我認為當時去參加學運的人都懷有一些理想，但是這些理想未必只是政治上的，雖然政治是個切入點，所以我覺得三月學運可以擺在特殊的環境，就是那一個月的情況下來看，說它是政治議題引起的，或者擺在長遠的情況下可以說是結構引起的，但是都還蠻空泛的。我剛剛一直區分想談的是說，從學生運動主體就

目的來看或效果來看。若就效果來看，三月學運使國民黨的體質得以調整或更健全。原先國民黨的基礎和上層政治權力的分配的管道，事實上並不符合，三月學運後使他們起了動蕩，而能夠調整。

致平：所以三月學運是場罪惡嗎？

如果把三月學運擺在學運本身的脈絡下就有很多主動性去擴充

斐琪：為什麼不談談三月學運本身？比如說三月學運本身的空間，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其實那不是台灣本身主觀創造出來的，是相應於六月學運在大陸發生所創造的空間。而這樣的空間創造出這麼多的群眾來，這對台灣的學運而言是什麼意義？那大家在談三月學運在政治上的意義這對一般的學生來講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四大訴求的提出，根本不是在場的學生要提出來的，而只是一群學生。所以我覺得學生在這裡已經區隔開來了，有一群學生比如說決策小組，和大部份的學生是不一樣的，那三月學運對他們而言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台灣的學運可以繼續搞的話，重要的是那群只參加過三月學運而後來就不再參與學運的人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這是我比較想知道的東西，而不是剛剛大家所談的那些。那些對你們而言才有意義，對大部份的學生根本沒有。

若愚：我試著把我的意思講清楚。我們現在在談三月學運時，有一點不能忘記，我們都還是當事人。對我們而言我們不是要去討論三月學運客觀上到底造成了什麼改變而已。同時它包括三年來我們作的種種的一切，而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要談談我們希望三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變成什麼樣子？期望三月學運對往後的學生運動有什麼意義？

添圍：題綱設計得不好，害得大家的討論變成這樣。不過我覺得大家的討論還是很有意義的。希望大家能簡短地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東洪：我個人在三月學運時情緒很高張，好像學生可以藉此展現一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



●三月學運替小資產階級開拓了空間？

可能很模糊，但是卻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可能有很多人可以做，比如說有些女孩子就試圖去組織那女學生，有些搞劇場的或搞藝術的就會設法讓廣場更加藝術化、豐富化。當時我也的確抱有很大的期望，覺得三月學運有很大的可能性，可能會改變台灣的一些事情（非只有政治上的）。當然我們在檢討三月學運時，會覺得應該有人提出運動發展上的策略，或者分析當時的政經局勢，同時也要有人留在基層，進行組織規劃或訓練。但是就我目前所關心的，我會覺得一個運動沒有文化是非常可惜的，在六、七天中學生的確十分苦悶，沒有任何新的形式被創造出來，總是在舊的框框內做事，那如果在未來十年內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那我們是不是會犯同樣的毛病。如果我們從文化這樣的觀點來看過去，我不覺得三月學運是個好的運動，我覺得一個運動應該是多元化，非常活潑的。如果再過二年，三月學運五年後我們還

是這樣在談問題，那怎麼樣讓現在在搞學運的人有個前瞻性。如搞完運動，他們發現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政治部門，那我們怎麼樣去說服他們，三月學運是場政經改革的運動？那你怎麼樣去說服他們說，三月學運的野百合不僅做為一個象徵而已，而是花費了藝術學院許多人的心血？怎麼樣去說服那些搞藝術的人來參與運動？喜歡玩音樂的人，你怎麼告訴他在運動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搞婦女運動的怎麼去參與高度政治化的議題？

那時的敵人是誰？今天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努力？

致平：像東洪所談的，原先也在我們的考慮之內。但是之所不在這個討論會談，因為擔心那樣做，要邀請的人太多了。如果就過去作為決策小組的一員，現在聽到三月學運的意義是替小資產階級打開政治空間，其實是蠻幹的！我覺得應該把當時種種可能性談出來，看看究竟是什麼可能性。我覺得從這方面來講，三月學運的確也有成功的地方，而且並不是事後之見，事實上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空間會不會這麼快打開，三月學運的確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剛剛談過，當時在KMT手上有各式各樣的方式：譬如說從廢臨時條款到申請大法官解釋臨時條款，或者由局部的改選來達成全新的國會，這都有可能，可是每一個作法所引起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政治議題看，那時候我們提出解散國大和廢除臨時條款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意義的。這個意義除了廣泛地稱之為自由化和民主化以外，我們也可以從許多制度化的層面看到說，其實有那麼多空間如果真的能夠打開的話，那我們也能夠進一步去談在那裡面各式各樣的東西。當然，很遺憾的是說，在當時運動的情勢之下，不管是群眾組成或是社會局勢來講，三月學運當然不可能發揮那麼大的威力，除非真的革命成功了，不然很多時候，即使是在制度上的成果，也都是統治者在和敵人鬥爭時所製造出來的而已，如果從

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對於任何運動的成果當然都會非常悲觀。可是不可諱言，三月學運在政治上它提出很多可能性，同時也包括在經濟上我們一直想要去對台灣重大的經建決策進行的鬥爭，都一直沒有被實行。所以，從今天再來看這麼問題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一段歷史：當時的學生運動到底要不要參加新國會運動，到底要不要作尾巴主義的爭論。但是當三月學運呈現出這樣的結果，以及今天新國會已經完成時，那到底新國會運動是個結束，還是一個新的開始？我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過去的新國會運動已經結束，現在的國會只剩下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需要去填補或者修改，已經不再具有廣大的意義了呢？還是現在的國會還有許多重大的問題需要去解決？那我個人是站在後者，我覺得當初所提到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二分法，如果我直接把它看成是人脈的、省籍的、老舊的區分的話，那麼台灣的轉型，就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談，是從什麼型轉到什麼型？事實上，我們今天就是在台灣正在轉型的過程當中，正好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才有可能進行著許多努力，如果忽略掉這一點的話，在人家結構已經很緊密的時候，你要去談什麼運動？那只不過是以卵擊石的空想罷了。今天我們在談這個問題時，我們就必需談清楚，我們今天到底要作什麼努力？那時我們的敵人是什麼，今天變成什麼樣子？我想我們必需去解釋，當我們去從事一場運動時，我們所設想的運動是什麼？這個層面跟自由化和民主化這個層面的談法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在非主流派這個集團當中，包括新國民黨連線的一些人，他們提出來的一些想法，有關於一些黨內民主的，有關於一激進民主的，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意謂他們在未來在進行一場新國會運動，我想這很令人懷疑。我們必需把這些事情談清楚。

東洪：我有個想法：如果我們要在野百合通訊三月學運的意義，用一個座談會想要統合大

家的意見，我覺得十分不恰當。如果要把它做的好的話，不要只從學運團體的觀點去談三月學運。比如說，我有一次碰到一個舞蹈者，他跟我說三月學運讓他最感動的不是去了那麼多學生，而是有一天下雨，學生把睡袋晾在國家劇院的欄杆，他很驚嚇地說原本二個象徵神聖的藝術表演的空間，只是由于學生想要幹什麼就改變了這個空間的暫時意義？如果我們要談三月學運，應該從這裡來談，比如說有些人對政治問題看得比較透徹，那就由他來談這三年來在政治部門是怎麼樣運作的，社會運動在這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談三月學運，我們就是把討論做了一個起頭。這樣的意義的重塑我認為也比較具體，具體是說，有許多人都參與了運動，這些人從不同的觀點、角度去詮釋他的意義，總比我們用題綱來談所做出來的整理來得還好。另外的一個原因是：如果野百合通訊每一期都用這樣的方來辦座談，我不曉能夠辦幾期？我不相信所有看野百合通訊的人都對政治議題能夠保持那麼高度的興趣。

紀舟：我比較想談的是，三月學運完之後政治經濟局勢有了什麼的變動？我們的因應對策是什麼？尤其是政治局勢和議題？這我比較在意，因為現在在校園內的學生，他們都不曉得要幹嘛？我們在思考我們的政治路線，以及在我們大部份的人都即將投入政治部門的時候，這些想法如何帶入校園？以及如何被實踐？同時我想在座各位也常在想，運動的成果如何避免政治鬥爭或政治體制吸納進去。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前提下我們實踐的路線尚未形成。如果這樣，校園內的學弟妹在看我們的同時，會不曉得自己的前景在那裡？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曉得如何摸索，或者連我們自己都不能告訴自己，那怎麼樣告訴學弟妹該怎麼做。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重新去告訴他們三月學運是什麼？剛剛的討論還是讓我覺得很模糊。

斐琪：我之所以不願意將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



●三月學運的刻板形式到五月有了一些改變，開始有小蜜蜂和宣傳車的出現

革的脈絡來談，我覺得學生對於政治改革的撞擊並不是那麼主動的，如果大家把三月學運擺在學生運動本身的脈絡下來看的話，它就有許多主動性可以去談，去擴充。可是我覺得三月學運最大的問題是，許多學生的社團慢慢在萎縮，三月學運時爬到最高峰，接下來就沒有了。現在很多學運社團變成只有少數幾個人，那到底三年來是怎麼搞的？是每個組訓者不會組訓的原因嗎？如果三月學運當時可以那樣搞的話，為什麼現在不能？這之間的改變到底是為什麼？所以我才不想從憲政改革的脈絡去談它。

尚志：我覺得很抱歉，剛剛在談三月學運時，好像是在天上看著地上的事情去談它。不過，我最近很深刻地感覺到，如果人們不能很明確地去認清擺在他們面前的事實的話，你絕對沒有辦法去堅持你的理想。

若愚：剛剛我們在談的是三月學運該怎麼談，我想請問主辦單位這場座談會的紀錄，要用什麼方式整理出來？當然這不僅是主辦單位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剛剛的討論對我有些觸發。我從兩方面來談。對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三年前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而是這三年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也就是三月學運本來可以變成更有意義的，那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另一方面，東洪的話對我而言還是深具啟發。可能也是這三年來我花的力氣也是在文化方面的問題。對我來談，三月學運那時，甚至到現在，在討論野百合的那七個小時，是最激烈，也最深具意義。可是野百合製作後被當成現成物來理解，當時討論過程甚至在野百合塑像的搬運過程這中間所引發的種種意義都被後來用不塑鋼所塑成的野百合給人的意義所取代了。野百合被用新的，不同的意義去理解，它重塑或引導了新的意涵。我們編野百合通訊時當然是希望現在在搞學運的學弟妹都能看，如果我們只談三月學運是怎麼發生的，怎麼能吸引他們去注意這個問題呢？

勇言：澄清兩點，第一點，我還是比較遵守題

綱來談的。第二點，我比較不感性，當談到這些問題時，無可避免地著重在政治經濟這方面。我做一個簡單的小結。三年來，小資產階級上了談判桌了，是不是有弱勢階級的空間，這是要注意的。

威霆：我覺得談三月學運的意義也許可以沒有結論。東洪所提的文化方面的問題，讓我十分震撼，就我在三月學運時個人的狀況，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人，分裂成兩個部份。一部份是擺在一個動盪的大的局勢裡面，每一步所作都有可能影響到全盤，那些影響我認為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必需小心翼翼。可是另一方面，第三天的時候，我們一些人在談60年代的一些文化創作的問題，覺得廣場上為什麼這麼死板，應該創造出什麼東西。之後我和一位朋友的想法有非常大的差距，他在想的幾乎都是運動必然有一些影響，如果因運動而造成一些改變的話，那到底要讓誰來收割，獲利？而我在想的幾乎是，我覺得學生幾乎沒有創造出一些比較會有創造性的文化出來。這兩年來又有一些新的看法，我覺得要有學運的話，應該在文化上有一些新的創造。之後，我又不這麼覺得，像60年代的學生運動，基本上是反傳統，可能是創造，可能是破壞，但是不管是如何，純粹地反傳統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傳統之後，人還會考慮到一些東西，比如說責任等等，這個時候，人是牽涉在一個很大的經濟和政治的脈絡內，比如說，一個反叛的音樂，他要反叛什麼東西，背後代表什麼意義；一個不鏽鋼的野百合，它要花多少錢，這些問題一想下什麼，也許最高的理想是關於人性的，文化的。但是運動過程不免都有政治的影響，或是社會的效果等等。

斐琪：三月學運的刻板的形式五月有了一些改變，開始有小蜜蜂和宣傳車的出現。今天來看三月學運，我認為它是個起點，這就是一個大規模的學運而言的，之間大家在分析

三月學運在台灣政治經濟的意義，我覺得那很重要。但是如果今天談三月學運只能談到它在政治上的意義的話，那正好證明了當時的決策小組只是少數。三月學運完後，一直到1991年三、四月，我一直在輔大的土地劇團，我在想是不是有一批人在做這個東西？我想有的，而且在三月學運前台灣就有一批小劇團不斷地發展，他們也關心台灣的社會問題，可是他們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在展現。不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也許這場座談會就讓大家了解，這三年的學生到底在幹嘛，在校園內發展出了那些形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至於關於政治經濟的分析，就由幾個人討論，把它寫成一篇文章就好了。其他的部份我們要著重討論，並紀錄它，讓校園內的其他學生看到。因為並不是每個學生未來都會和各位一樣。而且這也牽涉到學生的反省能力到那裡。

添圍：先澄清幾個狀況，等一下第二、三個題綱大家可以合在一起討論。其次，我不覺得這些人有進入政治部門。因為在座的人離政治部門還差的遠，我不是說他們跟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我的意思是說，進入政治部門對學生運動而言是一種惋惜？感慨？還是一個不好的評價？

今天的討論雖然不見得有什麼具體的結論，但是我想總是遺留下許多問題促使大家去想想。比較有趣的是：有些人去當國會助理，有些人還留在學生社團，今天的討論正好反映大家在這三年的一些轉變。同時我們不可能把三月學運的意義全部找來，因為不可能把廣場的學生全部找回來。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二、三個題綱。

一個全島跨校組織

沒有各校基層實力必然遭受挫敗

致平：三月學運當時和之後，關於全學聯的組成和之後的運作，我有一些想法：是如何把

學運的力量集中起來，而不是把學運的組織集中起來。三月學運本來就是一個異質很高，而突然有一個機會讓大家聚集起來的機會。其實在當時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是應當去容納不同流派，不同的意見。只是問題在於如何把它集中對外展現。本來在思考全學聯的如何運作，組織過程，以及和各校園的關係時，都暫時不去構想一個十分成型的組織。所以後來看到因為某些因素全學聯不得不和台大的某些學生或社團分裂時，我覺得不是很恰當，本來把全學聯當作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就不是很恰當。當然後來的情況是有一些轉變。我想那後面再談。

斐琪：為什麼校際串聯串到後來，看不到什麼成果？

致平：談到如何去創造全學聯時，大家有一個一致性的意見，要用運動來創造，而不是用串聯來創造，當然它也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動員過度頻繁，造成大家無力去經營校園組織。過去學生有許多嘗試，但是從來沒有像全學聯那麼具有公信力。第二個是說組織也許可以存活很久，但是公信力卻必需不斷地努力去創造，否則就很容易流於媒體上的效果。本來可以集中在組織或學生的資源，就統統集中在個人身上。

威靈：第一，為什麼三月學運完後學運會萎縮？因為在那時許多社團的主要領導人都已經大四了，這是很致命的，因為年輕的幹部可能沒有情感上的基礎，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樣，他們是比較分散的，不像我們有基礎比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三月學運完後，沒有有效地將年輕的幹部集結起來，雖然有辦過一些營隊，但整體的效果也不太好。另外，我個人的感覺是全學聯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很緊密的組織，全學聯在這裡暴露一個問題，因為有太多學校的組合，不像台大只有單一一個學校，平常的聯絡就很不方便。聚在一起時不是辦座談會，就是辦營隊，回去就又

各搞各的，沒有聯絡本來就會造成組訓的困難。這當然牽涉大家對全學聯的看法。再加上全學聯一開始就被貼上不好的標籤，比如說當全學聯宣佈成立時，有教授就希望全學聯能持續監督國是會議等等任務，這些外界的期望，顯然已經把全學聯規定某個路線了。所以全學聯一開始就因此沒有一個好的發展空間。接下來談一下東吳的狀態，三月學運對我們而言是比較不利的，由於學生群眾膨脹太多，造成錯覺，而去攻佔學生會，學生會攻佔下來，人就死了一半。同時三月學運好像一個斷點，分裂成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歷史的參與感而言，現在又碰到另一個困境：一、二年級的新生，他們根本沒有參與過三月學運，而且環境也不同了。他們找不到施力點，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當我們跟他談三月學運的歷史時，他們只覺得是一段故事而已。

回過頭來談全學聯，一開始的錯誤在於沒有釐清全學聯要怎麼運作，缺乏一個有效的聯絡人和聯絡管道，那麼多學校要聚在一起根本是不可能的。

致平：嚴格來說學運衰退不是一個很準確的用詞。我覺得學運串聯是第二位的。我們應該把校園的組織和校際串聯結合起來談。每一階段校際串聯的用意是不同的。比如說在大革會時代的校際串聯是為了要協助各校校園組織的發展。所以那時大革會的重心不是擺在大學法要怎麼修，而是擺在要用什麼樣的議題，讓各校能夠動，把各個學校的團體都能夠帶起來，動的方式包括協助各校搞運動，提供一些物資和人力的資源，甚至是讀書會和組訓的資源。這個為例是要說明在談校際串聯時要結合各校的狀況來談，要看到現在各校發展的困境是什麼？要如何發展？各校的差異如何？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按照以後的經驗不管以學生會的方式，以社團的方式或者以地下團體的方式都有不同的生存

樣貌，不同的生存條件。比如說校園的經營已經擴散到幾個面向，同時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那這時拿下學生會才有可能去擴大反對陣營。如果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的話，那校際的組織就有一個任務，它怎麼樣根據各社團的發展去調整自己的體質，和資源的運用方式。

另外一方面，校際組織無可諱言地，一定有它的對外關係的樣貌。社會各界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存在，這裡牽涉到的是，如果全學聯有一群核心在運作，是不是能夠把組織發展階段的需要，訂出明確的發展目標。從這兩方面來看，全學聯從誕生開始就一直處於不利的狀態之下，一個勉強的聚合，資源勉強的集中，社會高度期望而組織混濁的情況，全學聯的過去都值得好好檢討。

紀舟：全學聯為什麼沒有辦法組織化？全學聯從90年5月組織化談了一整年。有很多部份是人的問題，不僅只是情感的基礎，還包括意識型態和路線的爭論，同時這些也無法落實到各校基層。另外，在90年三月到五月之間大家在提的區域發展，因為事實上要將全島的校園整合起來，還包括一些新興社團，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才建議以地緣上的區分，先將區域的學校整合起來。同時這也包括了運動上路線的思考，在中區，像靜宜、中國、逢甲在運動上是可結合，雖然他們台獨的傾向很濃。像逢甲後來跑到民進黨，靜宜跟台教會很熟，但是在議題上的合作仍然是可以結合的。只是在結合的過程中一碰觸到核心的意識問題，就會使議題的結合不是那麼順利。在區域發展中，我們所要求的僅僅只是在運動上的合作，還是藉由這過程中能進一步去使路線發生影響？

勇言：如果先從組織去談的話，其實全學聯一直不是個組織，沒有扮演任何組織應有的功能。從90年的全學聯臨時會成立開始，就只有開過校際會議而已。其實全學聯的組織問

題在于各社團。各社團的組織作得好不好，每個社團都有不同的原因。嚴格來說是在獨台會案以後，除了重大的政治議題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議題、空間供全島的學生進行串聯。所以校際串聯，我們可以兩個方面來檢討：第一個就是意識型態上的對話，並沒有足夠的管道。因為我們主觀上期待用運動來串聯，而忽略了對話的空間，或者在全學聯的即有的架構下（校際會議）缺乏正式的管道來談彼此的路線問題，在這種狀況下更加



● 學運應該作為社會運動的黏合劑

深了全學聯只有在議題的結合下，才能有運作的條件。目前學運的衰退和缺乏運動空間，當然有外在和內在的條件因素，外在的條件居多，我個人的看法，三月學運以前，各校校園經營的狀況普遍不好。三月學校之後到獨台會案之前，每逢重大的爭議事件，各校每每都會動員出令人嚇一跳的群眾來。可是學運的組織卻一直都沒有擴大。也就是因為如此，學運無法去經營一個長期而具有效率的串聯組織。所以它很容易變成缺乏議題，就連校際會議都開不起來，同時校際會議規模的大小和成功與否，也端視議題和外界壓力的大小。

再者，由于各校基層社團的發展，在這幾年來情況不一，有必要擴大各校之間的交流，看看各校是如何經營基層團體的。否則常會出現有些學校在遇到事情時常找不到人，不然就是臨時動員到的。在三月學運前存在的社團，有些現在持續成長，有沒有變化，有些突然消失了。這個狀況有必要作進一步的了解。一個全島的跨校組織如果沒有各校的基層實力的話，那必然會遭到挫敗的。

致平：我想修正一下，在九二八大學法遊行前後，學運社團可以說是靠理念，而三月學運之後似乎就只能靠運動來整合。

勇言：我看到的社團都差不多，有些社團拉進了新的人，有些社團跑掉了一些。或者是因為分裂的緣故而…。

致平：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去選學生會，是因為有幾個想法：那時候在各校可能會冒出來的力量可能多而且雜。我們可以藉著進入學生會這個行政部門來統合這些力量，當然這個想法在現在值得再檢討。另外如果有一個學生會的話，其實全學聯就可以做為一個運動的招牌，作為學生運動的旗幟。而學生會可以作為在意見上或者其他方面可以發言的機構。

勇言：三月學運之前，法商很熱衷學生會運動

，三月學運完後搞完後，我們就放棄了。
致平：我的理解是法商一直在搞的是無政府的學生運動。

勇言：校際串聯組織的缺點，一直是沒有專職的校際幹部。

致平：無論怎麼談，學校的社團還是最根本的。

威靈：我也不同意三月學運完後學運一直在萎縮。但是有一種現象是，人都很散，平常的組訓活動要來不來，只有遇到議題時他們才出現。組織和運動是不一樣，運動比較動態。比如說獨台會案時，靠組織工作動員來的有近百人，當然實際來的比這個更多。有一群人他們不想留在火車站過夜，只想每天來火車站衝撞。運動好像是宗教祭典，全學聯就像是一個圖騰，圖騰一出現，就使得群眾的心理亢奮起來。但是問題在平常的組織工作是要持續地做。

另外一個問題是議題方面：全學聯一開始似乎都圍繞在政治議題打轉。但是奇怪的是政治的議題，似乎無法使組織龐大，總是只有少數的積極幹部在關心。同時在校園也發覺議題愈來愈難找，因為現在變得十分開放，校方做得似乎很公平，我們在雞蛋裡挑骨頭，還不一定會找到骨頭。於是我們開始想說，是不是搞一些社會議題。但是社會議題也很難搞，如果我們在校園裡樹起打倒資本家，那絕不會有什麼回響。問題在于社會議題經營的成果很難校園內擴展。我不知道非政治性的議題在各校的空間如何？難道只有政治性的議題才能夠動員到學生嗎？

勇言：提到社會性議題，我並非那麼悲觀，去年的1112三法一案大遊行，動員的人數和獨台會案差不多。

致平：三月學運前後，發惠有提出一個看法：學運應該作為社會運動的黏合劑。但是在實際狀況呢，比如說在反軍人干政聯盟時，外界都把它看成學界和社運團體的聯盟，也就

是他們把學生當作和教授一樣是學界的團體。但是後來我們並沒有和自由派的教授結合。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自由派教授在反軍人干政聯盟後就分裂了？事實上，如果當時和自由派的教授作適當的聯結，那後來的狀況也許就不會那麼慘了！

在接觸年輕幹部時 多聽聽他們在想什麼？做些什麼？

添圍：那我們花多一點時間來談談第四個題綱：三月學運後學運未來的展望，並做一下今天座談會的總結。

東洪：展望哦！就是希望下次在開學運座談會時，不要只有我們這些人在座談。能夠多找到一些人來談，這表示有很多人繼續在幹學運，不是只有我們在回顧而已。

若愚：有件事情對我衝擊蠻大的，在三月學運的過程中，藝術學院學生表現得十分積極，但是三月完後，在任何全學聯的運動中，幾乎就不會看到他們出現。這我也可以預想得到，全學聯會議一開完，他們帶著全學聯討論的事件，尤其是政治議題時，他們回去仍然得面對他們校內的實際狀況，當這些差距過大時，他們自然會沒有動力。所以，我的展望是怎麼樣發展出多元化的組織方法，因為不僅每個學校社團的發展的狀況不一，同時每個學校所關心的也不盡相同。如果要廣泛地團結這些學校，那麼多元化的組織方式是蠻重要的。

政亮：剛剛所談的有點抽象，談很多在路線上的，在意義上的東西，但是現實的狀況是怎麼樣呢？如果我們覺得歷史是發展出來的，每個階段不斷地改變的話，就不應該切斷來看。三月學運完，一些學運社團在校園具了某些正當性，於是會開始去衝撞一些東西。那時候我們談了許多路線，但我覺得在台灣並沒有路線，路線是做出來的，講那麼多路線，沒有做有什麼用？現實上要怎麼做，不是

你說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比如說，地方上的選舉，如果你著眼在人脈和資源的擴大，那當然要去參加。去的話，所牽涉到人脈和資源和思考方式都會因之改變，開始會摸清楚台灣的現實會怎麼變，一些政治人物的思考邏輯是什麼？你就會思考到無產階級鬥爭，人民民主這到底是在說些什麼？唯有知道現實是什麼，才能真正在現實上，在經驗上真正推想出一套路線。現在我們要做的不是理論先走，而是在現實中先衝撞。在台中每一次地方選舉，在校園中每一個議題，我們都要介入，這樣我們才真正知道什麼叫做路線。我們談要和社運團體結盟，社會運動到底在那裡，有没有人真正在工會裡面待？有没有真正在環保團體做？如果你真的要搞，那就先去工會裡面蹲，再提出路線嘛。台灣的現實我們認識得太少，我們只能在理論上在邏輯的必然性上去推想我們要怎麼樣，那些離我們還很遠。價值需要，意識型態需要，但是就運動而言，台灣的現實還沒有走到那個地步。如果要抽象出一套東西出來，也不是從理論來的。

紀舟：我記得野百合第二期，尚志的文章上有一句話：現在什麼都不重要，就是理想性格最重要。我的意思是：對目前的學運團體，我覺得展望很簡單，如果理想性格能堅持就堅持，生活上紀律能堅持也堅持，如果能多唸點書就多唸點書，如果這些都能做到，那未來還會有希望出現。

威靈：我不覺得一定要介入地方上的政治事件。做為學運和作為個人所參與的運動，那是有差異的。社會運動的場合我們參與過很多，中油工會、原住民的部落我們也去過幾次。但是回來的討論，卻始終無法進一步去推展，因為我們始終無法讓每個人都去中油工會看。我們發覺在政治事件上，最好動員人了，每個人都很有興趣，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投票。我自己是懷疑學運是否一定要走上

政治議題的路線？但是在非政治性議題上卻始終只是少部份人所能動員的。即便動員去了，我們都很難找到和社運團體或當地居民團體有繼續合作的可能。雖然我們關心的議題是多元化的，但是做起來卻有困難度的差別。

另外，我們可以來談談九二八大學法遊行。九二八不像三月學運是由大環境塑造出來的。是由于各校都很積極地參與創造出來的。過程中有許多學校串聯起來，但是也沒有一個常設的組織，只是藉由不斷地開會，工作任務所搞出來的。我們不一定要租一個房子，而把串聯的事著落在幾個人身上。把省下來的房租錢一個月去喝個爽，至少這樣還可以聯絡感情。

至於未來的展望：鑑於學運幹部第一代、第二代的差異，我覺得可以把我們過去的經驗，看法做得總結，或許出刊物，把它們傳下去。若再遇到重大的議題，我們應該調整心態，就放手讓他們去做，也許可是塑造出新的環境。問題在於當我們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未來怎麼樣將資源集結為他們所用？

勇言：重要的是社團不要不見了，社團不見了要搞什麼都很困難。現在的危機在這裡，當學生沒有被付與什麼或者沒有什麼實踐空間時，就不容易有什麼社團。至於要如何發展，就留給未來要搞的人去談吧！

若愚：我覺得未來要怎麼發展，現在還是有一些可以著力的地方。比如說組訓，但現在的問題是怎麼做？以教材來說，現在還是非常一元，根本欠缺多元化組織所需要的教材。我覺得這工作就不能只留給以後的人，既然現在大家在不同的位置，是不是大家可以共同來做點這樣的工作？

尚志：如果在場的各位，在聯繫年輕的幹部時，多聽聽他們在想些什麼，說些什麼，不要只告訴他們要怎麼做，我覺得學運一定會非常有希望。⊕

霧月十八弄是群泛民學聯系學運傢伙在一九九二年於南京東路五段上的棲息之處。在那屋子裏，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討論，三月學運是討論的起點。

不管被稱之派系或什麼，該公諸批評的，就不必避諱，這些討論文字絕對脫不了立場和路線，但是透過私下散發總是激起了很多有極有價值的觀點，來自學運朋友的，來自政運工作者的，及來自社運團體。我們決定一字不改把初稿刊出，希望能激起不論是贊成或反對更大的迴響。

三月學運

I. 政治背景及意涵

1. 90年7月美麗島系張俊宏提出“兩黨合流論”（美麗島系與KMT主流派合作），這提法是對外喊話抑或有其長期，宏觀的政治企劃？
2. 國大年會之前，民進黨立院部門已被抹黑而失去政治介入的正當性，而國會全面改選也被KMT以分期支付的退職案吸納，KMT本身又陷入主流派及非主流派二月政爭加上國大拒退，朝野雙方都已失去主導改革的正當性，這時第三勢力的介入正可突破僵局，三月學運正充任了第三勢力。
3. 正由於三月學運，修憲過程中才有民進黨，台獨翼力量的舞台進入國是會議--進入修憲的程序體制內，換言之，促使兩黨制

確立。

因此三月學運是各方所樂觀其成的，主流派，非主流派，民進黨或獨盟等等。

II. 學運部門

1. 台大學生自八六年〈自由之愛〉後很少面對不特定大規模學生群眾（非組織動員所產生之群眾），民學聯系亦然。民學聯則一貫對政治議題之掌握及隱含之社會意義缺乏敏感度。反觀之，首發至中正廟靜坐的台大大新社成員，的確掌握了行動的時機。
2. 就四大訴求而論：廢國大，開國是會議，停止動員戡亂及提出政經改革，與KMT，美麗島，新潮流系都沒有利益矛盾，因而各方政治勢力亦不須反對。廣場上一度流傳的鎮壓之說其實是自我恫嚇。
3. 三月學運最大的落空是一政治議題的主動性又回到既成政治團體手中，原因可能有二：
 - a. 過於樂觀的認為學運可成為第三勢力，而以人民民主，各社運團體結盟之方式介入政治鬥爭，無視於社運團體已在八八年初被鎮壓，無力和學運結盟。
 - b. 民學聯系缺乏政治運動部門的長期規劃（八八年至八九年）。這也反映出人民民主路線沒有政治領域的戰略。
4. 四大訴求之一：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其指涉對象是李登輝，加之對話對象也是李，這無異強化了李登輝企圖自外於政治

矛盾，而擔任超然的仲裁者的角色。

5. 最後收服各方政治勢力的是：國是會議一開始進入憲改過程。李登輝對四大訴求的回應有：國是會議，就職演說，六年國建。遺憾的是學生並未持續以“政經改革”此一訴求向政治團體施壓。
6. 八八年以後民學聯路線之缺失：
 - a. 強調社會實踐且堅持社運參與，而實踐上忽略了政治路線上的意義，精確的說，忽略了政治運動或議題的社會面。
 - b. 未能評估八九年後政治運動發展的可能性。八八年夏，社運開始被鎮壓，“官僚威權政體”之後在九零年浮現，這些問題未被認真對待。九零年之後學運之特色為政治性訴求強烈，為之佐證。

III. 總體小結

1. 三月學運使政治勢力介入憲改，使憲政改革在九零年成為可能。
2. 八零年代是世界資本主義再結構的時代，在台灣代議民主制的確立是主要的趨勢。
3. 人民民主路線的政治領域實踐策略有待補充。
4. 自主性學運的成長空間及機會，在往後的實踐領域裡，若是無法處理政治議題的問題，可預見會越益縮小。
5. 鎮壓社運是修憲安全的最大保障。由此來看，以國是會議作為三月學運的收尾，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
6. 李登輝成為各方勢力的仲裁者始於三月學運。 ⊕

1990

- 05.04 為抗議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欲重返中正廟和平靜坐，而遭警察強制驅離。
- 05.20 全學聯，知識界及社運界反軍人干政聯盟，共同發起反郝大遊行，抗議欲藉由郝柏村上台，以整治治安為由，大力鎮壓反對運動，以保證政治改革方向符合統治集團的利益。並緩和 KMT 日益加深的內部矛盾。
野百合正式安置于中正廟，以象徵三月學運的精神永不凋謝。
- 09.21 於迷你谷舉辦為期三天的幹部訓練營。
- 12.25 全學聯和新生代主權聯盟組成 1225 行動聯盟，赴中山堂要求國民大會召開制憲會議，並承認中華民國主權不及大陸與外蒙古，並無罪釋放黃華。

1991

- 04.03 赴陽明山中山樓，抗議 KMT 二階段的修憲。反對一黨之私的形式修憲，要求符合台灣人民利益的修憲條文，要求人民制憲。
- 04.17 再赴 KMT 中央黨部。
- 04.25 和反核學生工作隊赴台電大樓抗議興建核四廠。
- 04.28 全學聯中區各校於台中舉辦「反核四，反六輕」說明會。



- 05.08 爆發獨台會案，調查局逮捕清大學生廖偉程及陳正然等五人。全學聯暨清大廖偉程救援會16日進駐台北火車站抗議。后廖偉程等人於18日獲釋。並逼使執政黨當局廢除了懲治叛亂條例。
- 05.20 參與知識界反白色恐怖大遊行。
- 07.08 於林口竹林寺舉辦全島學運幹部幹訓營。
- 08 參與搶救八里十三行遺址行動，反對執政黨當局漠視少數民族的文化遺址。
- 09.07 和公民投票促進會、長老教會、台灣教授會共同舉辦「公投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 10.02 赴 KMT 中央黨部抗議立法院 KMT 黨團強行將核四預算案解凍。
- 10.08 和 100 行動聯盟發起廢除刑法 100 條運動，並於當日下午進駐台大醫院基礎醫學大樓，提出「反閱兵，廢惡法」行動綱領，但于 10 月 10 日凌晨遭驅離。
- 10.25 於高雄舉辦「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 10 協同友愛殘障協會發起「苦行百里」行動。沿途藉募款以諷刺政府長期漠視殘障人士的權益。學生並組織醫療隊一路陪行。
- 11.08 和各弱勢人民團體，社運團體於台大校門前舉辦弱勢團體晚會。會中要求國大修憲過程，重視弱勢人民權益。



12 全學聯中區和東海大學學生會，聯合中區各社團組成“中區大學生選舉觀察團”，延續三月學運學生對憲政改革的一貫立場和態度，於選舉過程中走入社會，觀察社會。並堅持反賄選及關弱勢團體權益的立場。

12.25 於台中參與“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1992

03.20 籌組“憲政改革觀察團”，於國大臨時會開議日時，赴陽明山中山樓，要求重視弱勢人民權益，重視教育權。並和一百行動聯盟共同要求廢除刑法第一百條，釋放政治犯。

下午，至教育部集結要求審慎重視憲法中教育權中之學生權益。

04.06 參與社會權聯盟，和各社運團體合作，共同在國大施壓，要求重視弱勢人民權益。

05.01 參與高雄勞工團結大遊行，抗議工運人士顏坤泉遭判刑入獄。

05.21 參與“原住民正名運動”，和“原權會”共同赴陽明山要求國大重視原住民權益，並為“正名”請願。

08.10 於核一核二（金山、萬里）等處，舉辦反核營隊。

11.12 和三法一案學生工作隊，共同加入由各工運團體所舉辦的三法一案大遊行。☺

學運

現場

教育是無主物
它屬於全體人民
且如果教育不給與人民
那麼他們將必須奪取它

～蓋瓦拉，1964

頭燈工作隊

12月12日星期六下午，分別隸屬於東吳視聽社、文山艸山學會、輔大輔工隊及台大國際社的幾名學生在國際社社辦聚會，決定成立頭燈工作隊，以持續對台陽礦業退休礦工的關心與參予。

工作隊的工作是預定在寒假前往石碇做關於礦工生活與工作狀況的訪調，並將之呈現給礦工、其他工人及校園群眾，可能採用影像或文字等媒介。12月25、26兩天將先前往石碇探勘，並與台陽退休礦工自救會溝通訪調事宜。

工作隊的目的除了針對台陽礦工外，也是為了在實踐中找尋「工學聯合」的具體內容，著重在學生參與工運的方式，及對校園的回饋。希望在1112遊行之後，學運能持續在工運部門的發展；並對學運路線的檢討與再出發有所幫助。

台大國際社

國際社本著一貫關心校園、關懷社會的精神，本學期陸續參與1112三法一案大遊行及台陽煤礦勞委會靜坐等社會議題；除此之外，也在幾位幹部的推動下，開始文藝小組的進行。

這個小組的目的，基本上是希望透過成員的討論，對現今校園、社會中的文藝或文化現象有些基本認識，進而尋找實踐的可能性；帶組的幹部們將這個小組進行的內容，大致到分為五個部份：文學史的基本了解、基礎文藝理論、作家論、文學／文化走向的剖析、實踐工作；這五個部分並不暗示有進行的次序之分，僅僅是提出這些問題意識以來刺激成員的思考，目前的進度，除了呂正惠先生幾篇剖析近四十年來文學生態的文章之外，也進行盧卡奇關於現實主義的討論，作家論部份則討論過李昂這位小說家，由時屆期末，未來整個小組的走向是否有調整的必要，仍有待討論。

文化批判一直是國際社持續關心的焦點，

我們質疑資本主義商品化的傾向已經滲透到文化領域中，好書排行榜塑造大眾消費的流行趨勢，評論文章精美的包裝、商業的廣告一同完成了觀者的品味與鑑賞，當代的人們，就像吃多了麥當勞的食品，都患了味覺遲鈍症；更甬提文化面與其它政治、經濟的互動與受宰關係，這只是一個開始，希望有心人士多給予批評與意見。

國際社、左派文藝工作室、你娘可好工作室



中央

中央大學在學運團體正片臨資深的運動幹部將要畢業，中生代幹部擔綱接班的時刻。或許我們用慣「青黃不接」的形容來描述這個現象，不過仔細瞭解校園的狀況，卻發現實際狀況不是如此。

目前學運有關的團體有：福爾摩沙社、環境生命社、新聞研習社及邊緣工作室。福爾摩沙社是1991年10月由原「三研社」改組，主要是

從事台灣研究，並且持續地關注而且介入運動議題。環境生命社則從事環境議題而且並不局限於運動方面，比如也和校方合作資源回收的活動。新聞研習社則是一個校園報紙的編輯社團，出版「新言報」。另外，邊緣工作室則不算是正式校園社團，是由新聞研習社的資深成員另外組成，有編輯一份同仁刊物「蟬螳報」，基本上是個同志團體。這四個團體彼此之間也不是各幹各的，平常，他們成員間彼此聯絡，私下做人際串連；運動中則以議題做結合。值得一提的是，由一群將畢業幹部在校外合開一家茶藝館「La vie」，則提供團體間聯誼、活動空間，對校園團體間的整合創造另一機會。

校園內的議題對這些團體而言，一直是持續關心的。由此他們也和學生會保持著合作的關係，學生議會目前的改革色彩並不強烈，或許是往後可以努力的目標。

社會或政治性的議題，以福爾摩沙社來說，曾經辦過與女性、原住民及勞工相關的議題的討論會，也探討九二年選舉對台灣政治的影響，地方的政治生態。讀書討論方面有台灣史讀書會、及討論〈激動！台灣歷史〉（前衛出版）、社會學讀書會、討論〈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理論〉（巨流出版）及〈1844經濟學及哲學手稿〉。

這學期校園內的社團將嘗試勞工及環境的訪問調查，例如採訪中正機場聯誼會，以類似的活動方式，擴大學生對社會議題認識的基礎。而校園本身相關的問題，自然是不會放過。雖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和和學生從事校園運動有一定的張力，不過，對中央大學而言，這已經不是二選一的選擇，而是兩個運動場域如何產生辯證的機制。

北醫

北醫身為一所私立學校，具有一般私立學校在國家教育資源分配上的劣勢，學生必須負擔

著比公立大學2-3倍的學雜費，卻必須忍受低水準的矛盾。這個矛盾在高學費的教育政策下更加劇烈。尤其北醫扮演著一個專業醫療技術人員訓練場所的角色，專業機構和師資的簡陋更能被一般學生更具體化的理解。

當此一教育機器運作上發生問題，例如私立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內部發生爭執，教育部與私校經營者嚴重對立……等等，原本隱藏於學生的不滿，便以種種形式的矛盾表現出來。北醫這些年來，由學生會所領導的「解散董事會」，「北醫國立化」的校園公民投票，以及最近的「北醫市立化」，就是學生及不滿北醫現狀的校友、教授們，在尋求此矛盾獲局部或充份解決所提出的議題。這是北醫校園抗爭的特色。

在這條抗爭主線上，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由於在選舉過程中所取得的正當性，一直是扮演各學生社團和校友、教授的接合點的角色。學生會的積極性正在於此。而另一個社團、北醫人報由於原是校刊，發行面廣，一直在抗爭的聯結面上，擔負宣傳及鼓吹行動的環節。

這些校園抗爭的議題，並不是直指在資本主義下大學的之所以會扭曲的根本矛盾，同時這些抗爭並不意味著每每都能牽動或者改變舊有的權力架構，而使之更加民主，但是在召喚一般學生對於基本權益的主動爭取，卻具有積極作用。

一定的運動條件，一定的運動議題，總是形成一定的群眾基礎，北醫在校園議題的抗爭中北醫學生對於現有的教育資源的不滿，形成了運動開展的條件，但是運動所累積的不管多大的群眾基礎，如果沒有恰當的轉化，轉化到北醫現存的種種落后，是根源于台灣這個資本國家下教育制度的性質，那麼運動的方向，就會在既有利益者的不同派系間擺盪，而無法有進一步突破的可能。

北醫的一些較鮮明的社團，在過去，和未來扮演正是這個關鍵性的地位。

這篇校園短波沒有實際的提到校園現有發展的實際狀況和計劃，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陷。原因是希望這個部份的補足留待各校園間更廣泛的交流來完成。

台陽煤礦血淚抗爭記實

高偉凱

一、過去

學生參與台陽文山老礦工們的抗爭已是在其抗爭末期的時候了，看見他們孤零零地夜宿在勞委會的廣場前，就如他們被老闆棄絕的晚景般，毫無足夠的援助，以支撐他們長期的抗爭。

然而，我們一群學生唯一能做的便是鼓舞他們的士氣，希望能透過安排各種節目，諸如：播放工人抗爭事件的錄影帶、教唱抗爭歌曲，或者表演有關老礦工的戲劇，希望能藉告訴他們：抗爭是有理的。也希望能因此使他們更有所行動，增加索取退休金的籌碼。那天看著民意代表、勞委會委員及資方律師對這群老礦工應獲得之退休金，像市場賣肉般地喊價。哎！這世界真沒天理，老礦工們沒有多少社會資源支持他們，長達四個多月的緊密抗爭，也使他們老而衰弱的身體吃不消，只得任這些豬仔隨意喊價，看著這場老礦工們被賤價賣出的場景，身為學生的我們感到無奈。

二、未來

在經過這次聲援台陽文山煤礦老礦工爭取退休金的抗爭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學生與工人仍有很大的距離，「工學聯合、改造社會」的理想還有漫長的路走。學生必須出校園對工人及社會做更深入、更徹底的了解。因此，我們成立「頭燈工作隊」。而第一步我們要做的是，將學生參與此次抗爭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及經過反省後的心得整理出來，並準備在寒假期間前往石碇鄉對礦工的工作狀況和生活背景作更進一步的調查。且將調查所得轉化為影像紀錄及文字生產，希望能對礦工們有所回饋，也希望帶回校園中，與同學們展開對話與討論。在「三法一案工人鬥陣大遊行」，學生們提出了「工學聯合、改造社會」的運動路線，期望我

們這次的工作，能對「工學聯合」這條路線的發展有正面且積極的幫助。當然，更期待任何形式的回應與挑戰。

三、討論

台灣的礦業是在「能源自主」的軍事考量，以及做為工業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採礦權及礦產的擁有皆為政府和少數擁有特權的資本家所獨佔，進而以完全無安全保障的採礦設備及低工資雇用礦坑附近的居民為其賣命賺錢。

礦工們每天忍受著坑中的噪音、大量有害塵土、幽暗陰溼的工作環境。無時不刻不在工作，甚至連吃飯也沒得停下手邊的工作。如此賣命，換來的是斷手斷腳、矽肺腫、青光眼等等職業傷害，卻也無所賠償。並且，老板賺到了錢，卻總是獨享剩餘價值而轉投資，進而積欠礦工工資不給，還騙這些不識字、生活環境封閉的工人們，老板沒錢、倒了，或已經換老板了。

50年代以後由於利潤的降低，造成礦場被老板關閉，而這些大半青春都在礦坑渡過的工人，很快的就沒有利用價值。60年代的台灣大部份的礦工被資遷，或已到無工作能力的退休年齡，皆無法從老板的右袋裡拿到一毛錢。而文山的末代礦工即是台灣礦工處境只是冰山一角。文山礦場的老礦工們（大多已五、六十歲），在不識字、無運動經驗下仍毅然從石碇封閉的山中生活，走上街來，討回自己基本上應有的人權尊嚴及權益。直到12月初，老礦工們在勞委會及資方的脅迫下持續抗爭了四個多月。抗爭過程中有勞陣的加入支援，但其他社運團體卻無行動。至於不管是保守或激進的學生們仍處於蒙上眼睛，搗耳朵的狀態。

然而這些老礦工們在勞委會本是老板委員會

，及資方透過律師搞技術規避及運動團體「自顧不暇」下不斷自行運作，終究和資方、制度妥協了。

這之中有太多的問題如：抗爭無法擴散、運動主體經驗不足、無法堅持目標、及廣大的群眾對礦工處境的不了解，或了解而止於同情，無力溝通介入等等。

苦難和矛盾並沒有結束，要緊的是能否發展顛覆的武器及工作。

四、檢討

在行動中，我們一直面臨並思索這樣的問題：學生運動應以何種方式介入工運？工學聯合的新契機到底在哪裏？因為台灣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我們預知類似的抗爭必將層出不窮，而面對一波接一波的個案，該用什麼態度去看待？

台陽煤礦的這些老礦工們，基本上頗為信任勞委會的人宣稱的「誠意」，也認為年紀已大且多有職業病，無法進行較為激烈的抗爭活動。因而，和幾位聲援的工幹部談過之後，發現大家都頗為無力且無奈。其他的學運團體更因評估之後，覺得人力不足或將無力可施等原因

而放棄參與。只是，我們能期待「抗爭素質」較高的工人運動，以利我們的參與嗎？面對這一群生活在台灣底層，三十多年來在暗無天日的礦坑工作的老人們，運動的「評估」標準到底是什麼？

在嘗試著放映影片給工人看，並和他們溝通討論的過程中，我們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找不到適當的影片。老礦工們完全聽不懂北京話，因而若是國語配音的電影或紀錄片，我們便須要拿著效果不怎麼好的麥克風，試圖將之翻譯成台語；而在有限的台語片中，也幾乎沒有影片描寫工人的生活—以工人看得懂的電影語言來呈現。除了一次次抗爭的紀錄片之外，放眼看到的，多是和他們自身生活割離的笑鬧片。更遑論，點出階級差異、矛盾，以凝聚眾人意識的影片。在放映於文化界倍受爭論的「悲情城市」時，這群從那年代活過來的老人們，仍是茫然……。

選擇以「記錄」的方式來延續這一波的行動，是因應「工運抗爭結束之後，學運該怎麼辦？」的自省，希望藉著文字及影像的記錄，將台灣礦業在台灣發展的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礦工們所受的剝削，以更明晰的方式呈顯。⊕

●工學聯合、改造社會的理想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La vie 是中央大學一群將畢業的學運朋友和在學的學運幹部開設的茶藝館。當然商業經營並不是主要的目的，據工作人員的說法，他們希望透過聚會、講座，以更生活化的方式，更直接地和校園內的學生群眾接觸，來從事本土性的文化運動，或許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種搞組織的方式和起點。

在成立以來，這個聚會場所已經辦過許多講座，從台灣的政經局勢分析，社會運動，兩性議題到本土藝術、宗教討論無所不談。也因為幾次講座都吸引了不少中央大學的學生前往，近來，很多的民間學術團體也主動和他們連絡，安排往後的活動。比如台教會、學改會、台灣研究基金會、婦女新知，都和 La vie 有合辦活動的經驗，或者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在和學校的社團互動上，這裏似乎擔任著校內及校外訊息的傳播站。學生社團借用這裏的場地開會辦活動，也取得和民間團體的連繫。而講座本身，也構成學生團體和外面知識上的交流。

La vie 的資金來源是由各方好友分紅入股組成的，這裏的分紅，目前還只有分擔紅色赤字的情形，所以也希望各位學運朋友有空能以行動支持。喝一兩杯紅茶飲料都是可以使其生存下去的。另外，中央大學位處桃竹苗地區，恰好位於台北和台中資源分配的尷尬地區，以演講為例，一些有進步性的講者，常常會過桃竹苗而不入，因此，La vie 的成立，或許會對這些現象有所改變。

La vie 在法文的意思裏是「生活」，中央朋友的嘗試也許代表著學生運動如何由校園延伸至社會的一種模式。相同地，如何把學生運動在過程及結果落實到學生一般的生活中，也不止是他們的課題。（本刊記者楊添圍報導）

在東海校園，平靜無事的三月最近又掀起了洶湧的學運波濤，在短短的一個禮拜之內，校園內舉辦了一次升旗典禮的抗議活動，兩場的戶外說明會，一場室內說明會；海報牆上、教室黑板，以及校園裏的許多角落到處看到許多海報與傳單，記者們到處拍照訪問，要一探究竟：為什麼號稱民主開放的阮大年校長，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面對如此難以處理的學生抗議？是因什麼議題使得學生又開始集結，難道阮大年不比剛剛被趕下台的梅可望好？或者是東海的學生真的如此強悍，絕對不讓阮大年有些許喘息的機會，要對阮大年下馬威？當我們走入東海校園，閒情的步道與兩旁的鳳凰，的確令我們難以想像是在這種地方有如此雄渾的反對力量。而在隨手拾來的傳單上聳動的標語說：搶救相思林！

三月三日，由校方的機關刊物發佈了一個消息說：綜合教學大樓即將於四月動工，位置在東海僅存的相思林地。此一新聞一發佈馬上引起許多同學的注意。一開始在三月八日由人間工作坊首先以人間快訊的名稱製作了一份傳單，廣泛的宣傳此事，並且攻擊了校方的決策過程的問題，同時發佈了一份由人間工作坊、台研社、環生社、女研社、野鳥社、多媒體社、辯論社以及東風社共同連署的聲明。聲明中嚴厲的批判校方整個決策的黑箱以及校務發展計劃的付諸闕如。他（她）們問道：請問東海校務發展的原則何在？除了不斷加蓋建築物之外。同時提及兩年前在東海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遊行——搶救相思林的歷史。

毫無疑問的，經過上次搶救相思林遊行之後，相思林已經變成了東海學生的象徵；這

不僅僅是因為它是東海學生運動有史以來最壯大的一次，同時對許多從事學生運動的同學來說，正是透過那次的遊行將校方決策黑箱問題一舉提出抬面，並且將校方的顧慮集中在梅校長身上，以此凝聚了東海校友的力量，而在一年後逼使其下台。當然，決策的黑箱對於學生運動來說一直是個議題，從有學生運動以來此議題便如影隨形的緊跟著每一次的抗議，不論是學生權的確立，反對特別權力關係，乃至於所謂學生政府的成立，這些聽來龐大的題目其實最先標舉出來的也不過是校方的決策不能獲得學生的認同罷了；只是對於「什麼是教育？」這個問題，運動事實上也無能提出一清楚的原則性對案，更遑論對教育改革具體的內容了。而浮上抬面的總是「決策公開！」運動的口號與激昂的呼聲總是「學生權」不管他用什麼曲折的方式提出。

然而運動的形勢是不容我們的朋友們有太多的想像，就在三月九日，也就是社團聯合發出聲明的隔天，由社會系與資訊系的同學在升旗典禮時，拉起了白布條抗議校方的專斷。三月十日中午，上述社團舉辦了一場戶外說明會，公開於群眾面前指責校方，阮大年則與同學席地而坐，發表看法並與同學叫罵後離去。只是三月十日的報紙上，僅僅記得阮大年以校長之尊，席地而坐的民主風範，以及他純純的對東海的愛。

形勢急轉直下，阮大年誠懇的臉龐一下子吸引了許許多多熱愛看起來有長者氣度的校長的朋友。況且阮大年說，要在哪興建綜合大樓他無權過問，因為這是建築設計專家的權力，尊重專家的設計才是對的。正如同訓導長在升

旗典禮上對拉布條的同學說，此事應該要有良好的溝通，而他無權過問此事；也正如學生會說，他們完全不清楚事情般，整個東海大學的校方行政單位就剩下了幾個建築專家，「專家治校」而且就僅僅剩下專家，在這幾天成了東海最佳的寫照。沒有人敢說教學大樓要蓋在相思林地，但同時也沒有人敢負責說：不會蓋在相思林地。

說明會隔天，三月十一日晚上，由學生會邀請了校長、建築專家、教務長、訓導長以及總務長等人，舉辦了一場室內說明會，同學們蜂擁而至，準備許多的問題要請益各「長」們。可惜阮大年一開始說了一些話後便離去了。只剩他愛東海的詞句不斷流傳，以及專家長達一個半鐘頭的專業說明。從建築技術的眼光來說，專家總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同學反對的



● 決策黑箱對於學生運動來說一直是個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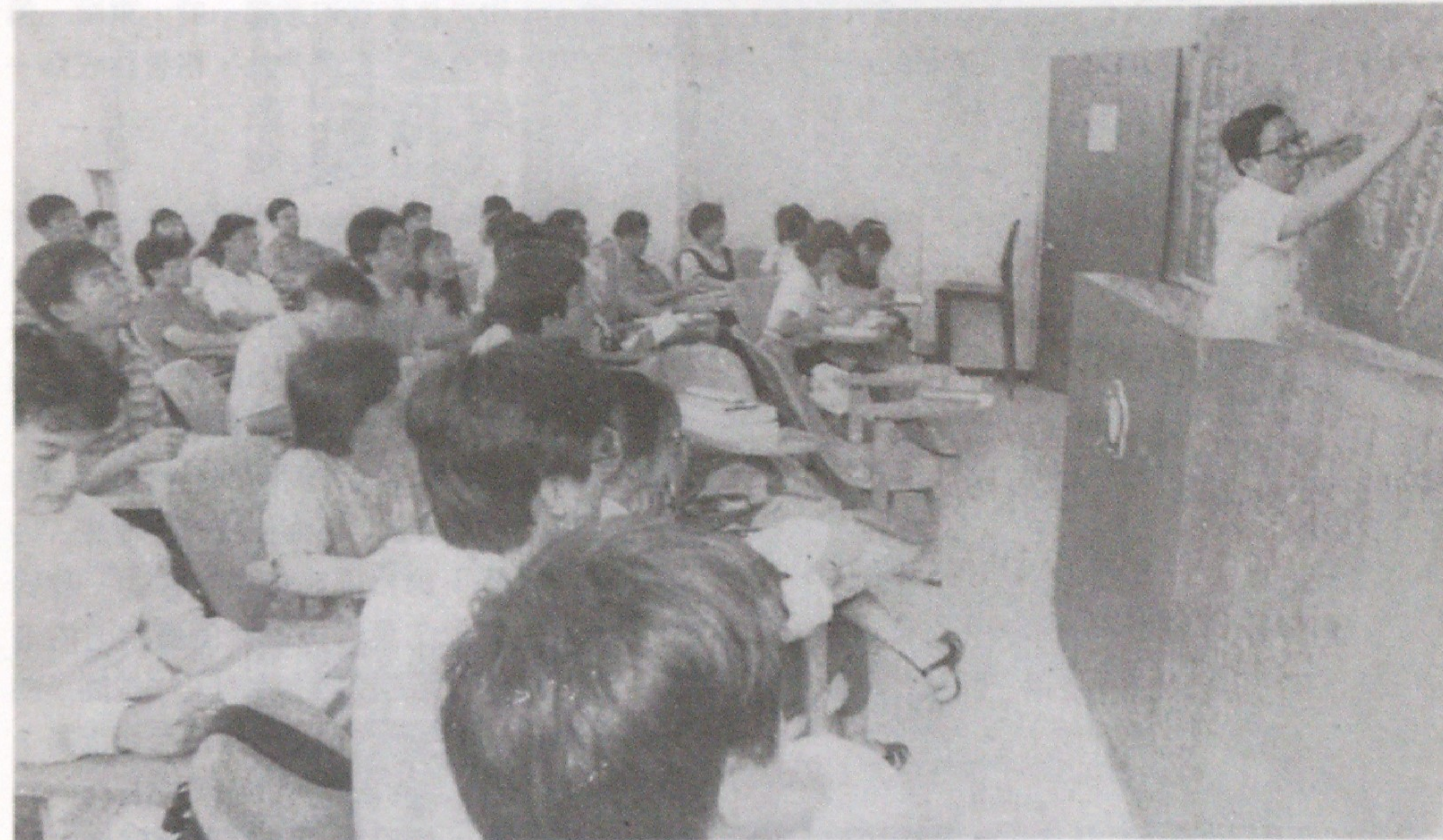
意見仍然旺烈，聽不下所有專家的話語。

專家說，其實他也不想蓋在相思林上，而且本來對於校園長期規畫的方案他也從不喜歡此事，只不過阮校長為了申請教育部的一億九千萬經費，一定要趕在六月開工，所以不得不趕出一份「假的」設計圖，交給教育部以便應急，同時東海教室實在不夠用，於是要有一個地方能夠「假的」給教育部，又能「真的」對東海的教學空間有所幫助。而便在真真假假之中，專家兩天之內應急趕出設計圖，同時符合教育部最後期限，加上多嘴的校刊編輯，牽扯一齣荒謬大戲。

但是同學卻問，校園規畫到底能不能與整個校務發展配合？還是每次都是為了應急亂幹一通？學生人數到底要不要控制？還是每次學校沒錢就擴大招生，就成立夜間部，乃至於販賣學位給省政訓練班、企業家們，美其名社會服務，其實卻將大學教育的精神——非為需求而授課，乃為理想而教學——棄如蔽屣。同學繼續問道：好吧，東海將來要往什麼方向走？要教育什麼東西呢？或是說，大學到底要幹啥？同學硬是不從技術層次去計算每一個東海學生要有多少平方公尺的教學空間，偏偏從教育的理念性的、原則性的角度質問：「什麼是教育？」

歷史縱使總是弔詭的，但此次卻不只是弔詭，而是上下顛倒；是學生關心什麼叫做教育的理念，而不是辦學的人在思考教育的理念，當然更不可能要這些辦學者實踐其教育理念了。由一個從不反省什麼是教育的辦學者來教育已經開始反省什麼叫做教育的同學，當然只好不斷強調要「愛」東海了，或者瞪眼看著學生在抗議，除了束手無策之外，恐怕便只是強調自己苦處，以使用痛苦的臉龐博取學生的同情。一個大學生，是學生在思考上走在前面，只好一切都相反過來，用頭在走路，而荒謬的用腳在思考。

但是，用腳思考也罷，用頭走路也罷，學生會這次可認真的反省，我們究竟要什麼大



● 今日的大學愈來愈發展，規模愈大，就愈像是一所超級的補習班，或是職業訓練所

學？不僅僅像以前一樣只會嚷嚷：決策權！

當我們翻開東海的校史，裡面寫道，一開始建校時，原來景觀上的設計是要求要將所有的建築物全部置於樹木的環抱之下，聞名的文理大道盡頭原先就是相思樹林，人走到路底便要全然隱沒在樹林之中，所有建築都皆是平房，以便人可以在樹的覆蓋之下謙卑學習。創校的人說：「這所大學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我們的課程不是為了技術性的職業，而應著眼於各個範圍；我們要學生生活在思想的氣氛中，要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這所大學要有民主的觀念的實際表現……。」因此東海的創立，一開始便不是為了需求而建校，而是為了一個超越性的教育理想才建校，所以東海是小班制；所以東海上至

校長，下至學生每一個人皆要勞動教育，以便在勞動過程中「生活」，而不是生活在書本裡；所以要有通識教育，以便每一個人能成為「全人」，而不是訓練有素的狗；所以創校的人說：「我們要純樸而不虛飾的校舍。」

這一連串的動人信念，而今安在？當初創校的人無論有多少宏大的理想終究也是擋不住時代的洪流的；因為在今日的任何一所大學，沒有任何一所是如此做，包括東海在內。今日大學要培養的是有專門技術的人，要徹徹底底的白領階級，要造就能夠為各大公司所用的人，而非能夠投入生活的人，今日的大學愈來愈發展，規模愈來愈大，就愈是像是一所超級的補習班，或是職業的訓練所；而也不管訓練所中有多少談情說愛的故事，學生終究是要進入

社會的大火爐灶，但是學生只要學習如何降格去適應社會，而不是學習如何創造新的理想。

東海創校的精神宛如昨日之夢。
有些學生們卻仍然往此夢想艱苦的挺進。

專家說明會的隔天，三月十二日的中午，由台研社舉辦了第二場戶外說明會吸引了許多的人潮。他（她）們細數東海的轉變，他（她）們標舉了什麼是教育的問號，而校方没有一人到場說明。

阮校長打電話給社會系主任，以及約見人間工作坊與台研社的指導老師，問道：我究竟做錯什麼？學生到底要什麼？

已經是十三日的凌晨了，學生們正在開會，爲了下禮拜二的「相思林」公聽會……

有人在報紙寫說，東海的相思林真是倒楣，有些校友打電話回來說：媽的！又要砍相思林。有些人說：東海教室真的不夠用了。有些人說：我們就是徹徹底底的功利主義。像是

要不斷反省相思林存在的意義一般，東海一個禮拜之內人聲鼎沸，熱鬧非凡，相思林成爲一個分不清真假的象徵物。

但是如果我們將此一事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看，我們才能逐漸理解它存在的意義。如果說兩年前的保衛相思林遊行是學生對校方強悍的爭取：學生對於校內任何事務要有一原則性的決策權的話那麼此次相思林事件正是學生反省教育是怎麼的開始。同時學生提出一原則性教育理念，如同當年東海創校時的理想一般的堅定：大學不應再降格爲對社會的一種適應，不應區從於工具與技術這個層次上的理性，而應當有一個更具創造性的人文空間；創造而非適應，批判而非盲從，改造而非臣屬；相思林正是此信念的象徵，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於東海大學，靜看東海別墅商業氣息的媚俗，以及日益區從於功利社會的大學教育；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讓它永遠的質問：什麼是大學教育？學生要它成爲一個問號，讓所有人面對它時，要謙卑的反省以及永無止盡的真理追求。⊕

3.13 寫於大度山

歸零：開始射擊

社會革命

無法從過去導出它的詩，而只能從未來導出。

馬克思 1852



1. 自1987年開始的台灣政治改革過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體制正常化的過程，換言之，是由封建威權政體向代議民主體制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國家過渡。
2. 由於1986年起連續兩年鎮壓社會運動的成功，台灣的中下階級無力突顯出社底層的矛盾；直至1993年的憲政改造過程，成了統治階級內部赤裸裸的政治鬥爭。不同利害關係的統治集團競求掌握國家機器改造的方向，以謀取對自身最有利的獲利分配。
3. 當前政壇的兩黨三派間的縱橫捭闔正反映著這種現實。
4. 國民黨主流派所連結的是台灣本土壟斷資本的利益，他們希望在經濟上能更全面地深化自由競爭式的市場規律。政治上確立代議民主制。國民黨非主流派則是過去封建威權政體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依存於特權特惠式政經關係。出身正宗資本集團的連戰組閣，輔以掌管黨官僚資本的徐立德，更富意義於此。而民進黨則扮演著中小企業主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代表的角色。
5. 尤其，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基本上，是過去凌越社會之上的國民黨黨官僚機器內部，應否向本土財團開放，開放多少及如何開放的鬥爭。試以公營企業民營化而言，民營化其實永遠不是由人民經營，民營化代表的是由本土財團或黨官僚及其附屬財團經營，把法權上屬於國家的，開放給私人。
6. 有人以為非主流派在環保福利等社會議題上有比較契合中下階層表現。這只是假象。從兩方面而言：
 - 1) 這只是一兩個單獨個人目前外在的社會形象（如趙少康、王建煊）。非主流派從未曾在任何社會議題上有任何集體一致的公開的公共政策面貌。
 - 2) 歷史上，保守封建勢力受到資產階級挑戰時策略性地利用中下階層人民的力量，亦屢見不鮮。（當然，資產階級在向保守封建勢力挑戰時，更是經常策略性地利用中下階級人民的力量。）
7. 在國際分工，區域整合的壓力下，外在世界環境是不利於非主流派的。非主流派在大勢所下要自願地或被迫地放棄過去自家人利益輸送的特權特惠

而成為資產階級集團的一員。

8. 可以預期的，隨著利權擴奪的深化和激化，統治集團內部必然還要分殊出更多的利益集團。收買、合作、對立將不斷上演。未來政壇的代表利益形式決不只兩黨三派。
9. 因此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之外，我們更需要多觀察第二屆立法院中是那一些利益團體的聲音針對那些議題在討價還價。大陸政策、六年國建、產業升級、土地財稅、社福健保、環保勞工，這些問題必然環環相扣。雖然政策內外的批駁，總是披上“公共政策”及舊有政治語言的外衣，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牽動了那些集團間，或集團內的矛盾，及對台灣社會的意涵。就擁有龐大家產的國民黨而言，如何把黨營事業以各種方式開放或轉化，及讓渡給誰，更令人注目。
10. 對中國大陸的關係，則是十分重要的變數，在臺灣尋求獨立的國際人格之時，兩岸經貿依存度的增加將如何影響台灣的國家認同、產業升級及其衍生的社會矛盾，是各階級都必須面對的。
11. 而所謂李登輝政策，或李的全盤規劃，其實是形勢逼人強的。本土資產階級的興起，迫使國民黨選擇揚棄全民政黨的外衣，確立其統治基礎。為順利其政治改革而鎮壓社運，喪失了以工人運動發展迫使產業升級的外在壓力。中國大陸的開放改革，強化台灣的資本及產業外移。美加墨三國的局域整合，使包括台灣的亞洲四小龍失去加工出口的腹地。誠然李登輝有其國際視野，但這其間並沒有多少遂行其個人意志的空間。在現實上，並不存在李登輝政策，更遑論全盤規劃。
12. 台灣的前途，自蔣介石以降，從未曾操縱在個人手中，台灣的社會矛盾亦絕不會因個人意志而轉移。二十世紀末的台灣才正位於十字路口！ ☺



●台灣的前途，自蔣介石以降，從未曾操縱在個人手中，而社會的矛盾亦絕不會為個人意志而轉移

「畢業的學運份子」這個名詞，乍見之下似乎像失去戰場的將軍一樣，有著嘲笑的意味。但是也免不了有著警惕的效果，和提醒自己社會身分轉變的作用。以下就是試圖以一位脫離戰場好一陣子的學運參與者的觀點，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引起更多迴響：

1. 學運的正當性 1990年三月學運的確確立了學運的正當性。然而回顧當時的政治情勢，正值國民黨陷入主流派及非主流派二月政爭，七百多位萬年國大拒退演出山中傳奇，而在野民進黨在代議機關只掌握最多五分之一席次，加上意型態機器全面抹黑，朝野雙方都失去了主導改革的正當性。這時學生蜂起，充當了突破僵局的第三勢力，為建立台灣現代代議政治補上臨門一腳。也就是說，學運的正當性是完成於政治改革的裂隙上的。如果，我們接受下面粗糙而大膽的說法：在野勢力加上學運，終使國民黨割除它最封建的部分，使國會改造有今日所見的樣貌，那麼，隨著民進黨在立法院取得三分之一的優勢及分合未定的國民黨，學運整體和這兩大政黨的關係，將是全新的面貌。

2. 學運的兩大場域——社會實踐及政治實踐 社會實踐和政治實踐當然不是互斥而且可以互相轉化，但是這麼說只解決了文字上的問題。1990年後學運在社會運動方面萎縮了，之後我們看到的是頻頻在政治運動擔綱的學生運動，學生在政治運動雖多助力，但是卻未形成任何辯證關係而創造出新的可能性。精確的說，忽略了政治議題的社會面，又未能將社會議題帶入政治運動。

人終究是部分地被經驗決定的。學生參與運動所學習到的思考架構也相應會沿用在對社會的理解上。被政治議題動員或動員去參與政治議題的學生，是不容易理解社會面的問題。以校園民主→學生會或議會→台灣代議政治為軸線發展出來的學生，腦海中的問題架構難免固著於學校行政體制／學生及其類似的國家／公民的二元思考中。如此而來性別、階級、壓迫、宰制等等不同面向的起點也容易被化約、降為次要問題。

3. 學運在校園 大學的新生是不會從聯考中知道三月學運的。雖然學運回到校園是大勢所趨，但是如何將校園和社會連結終究是不可迴避的問題，學生校園運動（只搞校內）和學生社會運動（學生搞到校外）永遠有無止的張力，和說不完的論證。新的問題可能是：如何面對不了解學運的新生？如何拓展具有豐富政治參與但相對缺乏社會實踐的幹部？如何在社運團體尚未復甦的情形下，開始建立新的連結？如何在過去的經驗中，累積出可資運用的成果？如何把學運擺到1993年的台灣中去思考？

「畢業的學運份子」的確是失去昔日戰場的將軍，但是失去的只是學運戰場。脫離校園其實也意謂重新擺置社會位置——而且這個社會正是想要改造的社會。沒有群眾，沒有幹部，沒有校際串連，更沒有「大老」的身分。然而，在社會化過程（不管是什麼定義），如何保持原先學運幹部彼此的關係維持，另一方面，尋找有利的戰鬥位置，恐怕是另一次野百合學運的更大企圖。至於，周圍質疑、嘆息、譏諷，也只有隨他去了，畢竟，只有實踐，才能杜絕眾人攸攸之口！

⊕

在民進黨掌握了立法院五十個席次、兩黨政治儼然成形的時空下，我們可以說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在某一程度上已完成所謂的「資產階級的代議民主制」這一階段性的任務了。隨著種種政治禁忌的突破，代議政治的確立事實上並沒有使「民主果實」更貼近於一般群眾的生活當中，反倒是愈離越遠了。在過去威權時代中，民眾對政治、社會事件因恐懼而造成的冷感，現在卻成了因「稀鬆平常」而愈見疏離，漠不關心。

新高兄在上一期野百合通訊〈先鋒隊、校園群眾與校園運動〉一文，詳盡地說明了政治、社會變遷後，學生運動在校園內面臨種種問題，提出了「長期經營」的可行之道；並對學運本質、主要戰場、以及動員校園群眾的方法、先鋒隊與校園群眾的關係等問題作了一番討論。文中他將「校園-社會」的關係放在運動主軸上，「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思考校園，是將中心點放回校園的本質」、「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校園的日常生活」。這些觀點對我們在面對校園群眾的「不動員性」時，頗具建設性。

在這樣視一切為理所當然的世界中，「戒嚴」及「白色恐怖」已不再是可以大規模動員的依據，如果學運份子只能一味地反覆操作這些「道德性的訴求」，校園群眾的不動員性是不難想像的。問題在於如何立足在實際「物質基礎」上「由群眾中出來」？

新高兄在文中提到「以政治經濟為基礎，可能從各學院、甚至各科系的特殊領域出發，都可以重新劃出一社會輪廓，……讓同學們重新思考在具體的社會關係底下的「自我」。換言之，黃文中所說的「物質基礎」就是指「貼近、扣合同學們所就讀的院系的問題」，如此方能有現實感。這樣一個命題事實上在學運團體中已產生過不少討論，不過在具體實踐中似乎尚未有明顯的成果，也缺乏明確議題、策略，仍有待各校同志們發展。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想談的是另一種運動思考方向——大學社區運動。

立足在「貼近物質基礎」的運動思考上，黃文所謂「建立各種專業領域的論述」其實可說是討論：如何針對各院系的「特殊性」來扣連運動的目標。因此，在這樣的思考背後必然存在著另一種選擇，即是「普遍性」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選出群眾的「共同關注」，甚至適如何去詮釋以及從中燃起運動的能量。所謂「大學區運動」的思考便是由這個角度切入。

誠然絕大多數的學運團體都會在自己學校內針對學生權益、師資、餐廳、宿舍……等生活週遭的問題發動抗爭，也獲得同學們的熱烈迴響，但卻導致了始料未及的後果：「校園抗爭已被定位為消費者自救運動」。此外，抗爭結束之後學運幹部甚致發現除了亢奮的激情和個別事件的解決（甚或沒有解決）之外，抗爭並沒有真正為運動累積資源、啓

發群眾。

學運幹部並不是黑犀牛（非洲草原上的救火員），我們也不負有人民學生保姆的義務。因此，大學社區運動的重點是必先釐清「抗爭的對象是誰？」、「運動的目的是什麼？」以及「運動的論述為何？」、甚至是重新界定「運動的主體是誰？」……在以往經驗中，對議題的選擇通常視其是否有足夠的衝突性而忽略其它；對議題的運作形式也只是「激化-對立-改善」的單線思考；此議題與彼議題間的扣連常被忽略；打擊對象未有效鎖定……等等情況都曾經發生，更有甚者，可能連運動的目的都模糊掉了。換言之，理念的釐清及長期的議題規劃是大學社區運動的首要步驟，一些似是而非的想像，「以為民喉舌為天職」的感性情懷必定要經過理性的策略規劃與精密的理性思辯才能真正創造出正確的運動路線。

以下就提出一些可能值得思考的問題：

- (一)校園群眾常被視為運動的主體，但這是否合於實際？是否有利於實踐？或者，他們更真確的定位是否應只是運動的對象？
- (二)學運分子是否應更宏觀地解釋一般同學的生活細節？一套結構性的詮釋如何產生？如何推廣？
- (三)先鋒黨在校園社團、甚至整個社區生態中應以什麼樣的角色發言？
- (四)先鋒黨如何看待一般同學在他身上所貼的「政治狂熱分子」的標籤？在學生群眾中如何自處？
- (五)如何解釋、選擇社區議題？
- (六)如何掌握群眾的需求？如何解釋與評估？
- (七)長期性開發一個或多個議題且不相矛盾是否可能？
- (八)如何鎖定主要敵人？如何切入主要矛盾？

上述這些問題若抽象地看待似乎沒有意義，但當我們將之放在具體案例中時，其重要性便很清楚了。例如文大的抗租運動，由於創造出數百人大遊行的場面而使多數人以為非常成功，但它在事實上並沒有有效地累積資源，為什麼呢？首先，它沒有鎖定敵人，在詮釋上也不完備；其次，抗爭的出現起因於「群眾的最大需求」，但在現實上並不必然是「運動的需求」；最後，學運分子在運動中的角色模糊，也無法精確掌握和群眾的關係。

大學社區運動不是以健全社區生活網絡為目的一般社區運動，我們並不將之視為一種「終極理想的實踐」，而是將之視為「在現實時空環境中，左翼學生運動所適合選擇的戰鬥路線」。我們相信在這後蔣經國時代後戒嚴時代後冷戰時代……等等一大堆的「後」的現代，學運分子如何調整以往大規模動員、期待狂熱的政治衝突的心態、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除了文化之外，這幾年在輔大、東海等校已開始思考「大學社區」的理論，並有各自不同的論述及實踐方向，有理由相信其他各校在不久的將來必會有這方面的重大發展。

面對隨著政經結構的變遷而轉變的校園，學運團體必定得在貼近「物質基礎」的思考上做出「世俗化」的準備。而一切基進行動的可能方能由此產生。 ☺

事先聲明：這篇文章是站在朋友兼同志的立場上，對《野百合通訊》第一期上所刊載侯念祖兄〈一場獨缺人民行動的鬥爭——論所謂：「二次土改」〉一文所進行的討論與商榷。這並不是什麼批判鬥爭或派系鬭牆的文章：望朋友與敵人明鑑。

念祖兄在《野百合通訊》第一期上寫了一篇極獲佳評、理路清晰的文章：〈一場獨缺人民行動的鬥爭——論所謂：「二次土改」〉。文中剴切地對涉入所謂「二次土改」的各路人馬進行了政治經濟的分析，文末並呼籲人民應涉入改革鬥爭中，作為「唯一的改革力量」。拜讀之際，對念祖兄的用心良苦，十分令人感念。然而其中的一些論點，總覺得如果不說明清楚，頗易讓人非議。於是不揣淺陋，借《通訊》第三期的篇幅，和侯兄討論一番。

☐ 批判李登輝？

念祖兄長達5300字的文章，其實是批判李登輝的文章。念祖兄在說明了二次土改的過程始末後，對王建煊、郝柏村做了一番評價，並說明二次土改是虛構的正義，然後就集中火力批判李登輝作為土地財團利益的代理人，揭穿並反駁李登輝是小地主、農民、擁有祖產者代言人的假象（同時也附筆說明了民進黨「反王」的理由），並解釋王建煊被拉下馬的原因是由於在土地財團VS製造業資本的鬥爭中，製造業並沒有堅決地擁王。

順著這樣的脈絡下來，讀者們或多或少在心中都會浮現一幅景象，起碼在「二次土改」爭議過程中，台灣諸資產階級的政治舞台上代言人是：李登輝/土地財團VS王建煊/製造業資本。（至於民進黨則在爭取小地主們的支持）顯然，念祖兄是頗為厭惡李登輝「拉攏大資本家作為他權力的穩定性基礎來源之一」，以及「將國家機器帶向成為資本的統治工具」作法的。而王建煊堅持按實價課稅的意見，雖然「離真正的土地改革還遠得很」，是「虛構的正義」，可是確也「並不排除王建煊的方案相對而言較具進步性」。而同樣的，「墮落」（暫用這個詞來作為「進步」一詞的對立面）的價值觀也同樣表現在對土地資本和製造

業資本的評價上，雖然相較之下並不是那麼明顯。這樣的好惡評價，使得念祖兄在反駁李登輝作為小地主、農民、擁有祖產的代言人這一點時，竟以“如果小地主、農民或是擁有祖產者，其持有土地的目的也是為了自土地交易中獲取鉅額利潤，那麼他們的土地自應也被列入改革的範圍之內。”這一點來批判（註一）。

首先，如台灣現實的經濟分析中，提出土地資本 VS 製造業資本這樣的區分適當嗎？

其次，如果這樣的區分適當，那麼土地資本—墮落（或較不進步） / 製造業資本—較為進步這樣的聯結適當嗎？

最后，既使前二者成立，那麼視王建煊較為進步的看法（甚至說一般所謂王是社會公義的代表）又合理嗎？

回盤根錯結的資本家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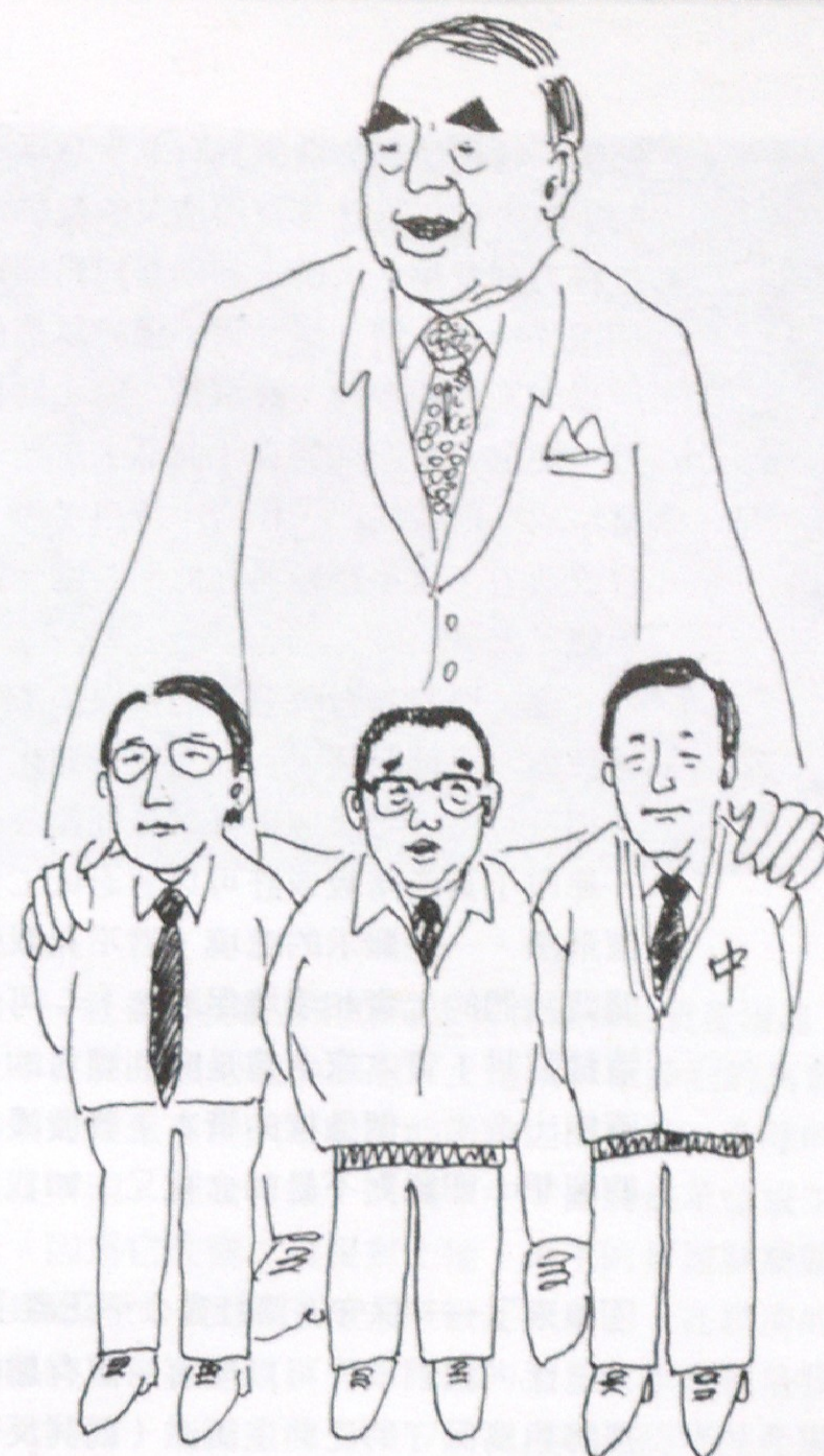
念祖兄在文章中認為：製造業與土地資本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因為土地成本上漲，進而導致製造業資本的產品價格上漲，減弱市場競爭力及降低其利潤，同時製造業資本支付勞力再生產的成本也會增加。

不錯，理論上如此，政治經濟學上是如此。可是這是在台灣。據說台灣土地投機炒作的根源有三：國民黨政府未曾貫徹平均地權（特別是都市平均地權），公告地價常遠低市售價格。此其一。國民黨政權為平撫籠絡地方派系，遂以地方利益，特別是土地交易所獲得利益作為選舉時動員投票的交換；於是在法令上規範空屋、空地、乃至於土地交易、地上建築使用的規章不是付諸缺如、就是漏洞頻仍；在人事上，各級都市計劃委員會則常成為特權、利益交換的場所及產物。此其二。除上述兩者外，流血流汗經濟“奇蹟”之餘，因為國民黨對民間資本向來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不僅由國營企業控管資源、原料高地（實質是公營壟斷）；復又限制銀行民營，進一步使金融資本無法成為製造業資本進一步深化其發展的出路。於是七〇年代起，土地投機逐漸興起，加上中所得小資產階級購屋地保值，八〇年代土地狂飆遂蔚為奇觀。

如果這樣的概觀不算錯誤的話，那我們便可以說明為什麼理論上的事實（或“應該”），在現實上卻可能是個假象。

台灣是有傳統製造和新興財團（也包括土地財團、土地資本）之分。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回過頭去看台灣這些大資本的發跡過程，就可以發現，在戰後四十餘年的經濟發展中，特權、保護、官民不分的情形屢見不鮮，雖然優厚程度有別（總是黨營優先於國營，國營又優先於地方派系、財團），總是依附在國民黨這個大家長軟卵翼下是個不爭的事實。而傳統製造業中從大陸遷台者自然又是一個執政者眼中關愛的對象。粗略的來說，這也是所謂“非主流派”的經濟基礎。

我無意在這裏討論省籍矛盾的問題，在這裏，問題的關鍵是在於特權。特別是與行政部門的特權特惠這一點上。設若土地租稅真照王建煊提案實施（也姑且不論“技術問題”），真正受害者還在於與地方、中央行政體系（如國稅局等監督執行單位）“關係良好”的財團！這裏面當然包括了許多傳統製造業！



當然新興財團也有這種情形，特別在今天國民黨在分裂中整合、整合中分裂時更是如此。一些未能受到李登輝抬愛的財團或土地財團，少部分雖可能嘗試押民進黨的寶，但亦有部分仍是投在“非主流派”的懷抱中。更遑論原來就在“非主流派”懷抱裏的了。

而所有的“可能”受害者，就應該是那些平時較少受到國民黨的關愛的本土企業和中下階級了。如果用政治經濟學的說法，就是那些自由競爭部門的資本家（包括製造業與土地資本）、中小企業和勞動階級及農民。

這樣看來，念祖兄實際上忽略了一個分析台灣經濟時很重要的面向：特權壟斷 VS 自由競爭。（或者是兩面向：特權 VS 獨立民營；以及壟斷 VS 自由競爭部門）講得平常一點，是在進行經濟分析的時候忽略了政治面向；講嚴重一點，是在政治經濟分析時忽略了“國家”的面向。

回進步性——製造業道德高尚嗎？

這樣我們也就比較可以來看一看製造業的“進步性”問題了。

在分析“製造業”問題時，習慣上我們會把它分為勞力密集或是資本、技術密集的產業。這種分法雖然不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窠臼，但至少不失為一種區分方式，因為這樣的區分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而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特別是中小企業）或分割國內市場（國、民營壟斷）正是所謂台灣傳統製造業的型態。比如王永慶的“石化王國”就是其中的

顯例。這種型態製造業具有進步意涵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任婦孺皆知，四十數年這些傳統製造業的發展，帶來的是低得可以的工資（這又以官方刻意壓低米價、剝削農民為前題），以及無人可住的环境污染。而這些社會代價，到今天不僅無以補償、而且也无法（也無意）改善。所以如果說相較於“錢滾錢”的土地投機，製造業是比較值得同情，因為它們還有實際的物質（商品）生產；可是如果製造業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或“進步性”，作為一個自由派，或許可以接受；可是作為一個社會改造者，就不應輕易如此。否則充其量只是一個稱職的資產階級的旗手罷了！

的確，面對著台灣惡質的投機歪風，有識之士都不免要高呼：遏止金錢投機、土地飆漲、否則產業空洞化、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將如影隨形，指日可待。可是這畢竟只是知識分子的議論紛紛而已。自由經濟學者、都市小資產階級或許可以容忍低工資、惡劣的生存環境而無法接受物價飛漲、一地難求的處境（君不見我們的媒體天天在抨擊投機，卻很少問問我們的工資和环境保護？）；可是一個社會改造者卻不應輕易掉入這種陷阱！資本家永遠是向利潤看的，環境惡劣可以出走；可是人民卻不能出走！一個像樣的資本主義發展或許是自由經濟學者們視之為職責的理想；卻絕對不是如念祖兄、如我輩者的理想！（註2）

囚狼來了——保守派講社會公平正義？

這樣，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一個有趣的現象了。那就是為什麼在政治上被歸類為保守的泛非主流派（就其反李登輝）的王建煊，反而許多時候被看成是“社會公義”的代表？甚至睿智如念祖兄，都還“不排除王建煊的方案相對而言較具進步性”？（資產階級的進步性？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進步性？）這是個要命的問題，因為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新K，特別是趙少康這種人身上。

就王建煊這種基層公務員出身的人，當這些看似較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較具進步性的意見出自他的口中，究竟該如何理解？當別人用技術問題批駁他時，我們可以看到他支吾其詞。而這種情況本來就是這樣，他的方案的社會公平正義只是“虛構的正義”，並不因為土地租稅改變“離真正的土地改革還遠得很”（這些都是對的），而主要是因為在這些意見提出時，忽略了現實社會中的運作機制——那就是“國家”，以及（如果你願意）“國家的官僚系統”，特別是在威權官僚體制才剛剛邁向衰退的九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經濟現實中。誰知道一切他口中的公平正義在特權關說橫行的中華民國文官系統下會成為什麼德性？在我們相信空口無憑的社會正義的同時，難道要我們忘掉，這一切亂象的始作俑者，不正是王建煊要我們忽略的黨國威權主義嗎？

這一切也同樣適用於新K（特別是新K的會長）、趙少康等人身上。當我們看到這批勇於內鬥的“民主鬥士”在夸夸其言“黨內民主”、侃侃而談社會問題時，我們看不到他們對黨外民主——我是說不論是代議民主也好，憲政民主也好，我們看不到他們的建樹。反而在關鍵時刻只會落跑，只會上廁所！真讓人噁心。



● 出賣人民，不分先後；利用人民，無論新舊（K）

回脫衣秀——社會公義裹身的保守派與赤裸裸的資產階級

土地改革其實是個嚴肅的課題。土地改革牽涉到的其實首先是地主與農民這兩個封建生產模式下最大的階級之間關係。全球的土地改革，第一次總是在所謂“開發落後”的國家中，由農民革命或工農革命轟轟烈烈的完成。因為它改變了農民對土地/地主的封建隸屬關係，因而也結束了舊的封建世代，瓦解了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在經濟的統治。然而歷史總是這樣的，當土地改革（不徹底的土地改革也就是我說第二次土地改革）在美洲的一些國家發生時，其實為的是防堵共產黨人在拉美藉土地問題搞社會主義農工革命，而先行消滅特權的地主階級，從而建立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把勞動力自土地的束縛解放出來，同時將被浪費在地主階級奢侈浪費上的資本轉移成工業生產（在當時是進口替代的策略）資本。前者的顯例是1949之後中國大陸的所進行的土地革命；而後者則可以說是適用於台灣的範本。

由此觀之，土地改革所帶來的土地利用，國土規劃政策的改變，乃至於生產力的提升，還必須看是放在什麼政經脈絡下進行的。比如台灣，農民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之後所激發出來的生產力，不是又被「分糖制」、「肥料換穀」、「隨賦征實」等政策被吸回到龐大的國家機器、軍公教及國營事業上，或拿去挹注工業生產了嗎？更何況只是土地租稅的改變而已？

而這還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而已。

在政治現實上，對真正懷抱社會改造理想的人而言，以下的情形確是吊詭而充滿陷阱的：政治保守的人，提出像是比較進步，比較像社會公平正義的口號；這時我們究竟應該站那一邊？這其實也是各國的社會改造運動者常面對的問題，在不具徹底改造社會的實力條件及背景下，面臨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內鬨時提出的社會公平正義的號召時，是不是應該選邊站。

我的看法是這樣：沒有伴隨著屬於草根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擴展（比方說農會、合作社、工會、社區委員會、區域性的、串聯性的……）及

民主組織的建立而來的社會改革，是口惠實不至的社會改造！社會改造與民主改造並行！這應該是我輩目前能接受的最低綱領。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拉美經由民粹主義又邁向威權官僚政體的歷程：結合勞動階級的城市資產階級鬥垮了結合小資產階級的地主封建階級後；終於還是遠離勞動階級，讓軍人和技術官僚統治國家。台灣的資產階級並不會比較和善，李登輝台灣人的外表也不會掩飾他作為土地資本代言人的實質。而在這一切過程中，人民被利用（放下身段“與群眾結合”？），繼而被出賣的例子太多了。高舉社會公平正義大旗的保守派（僅管可能受到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喜愛與擁戴），並不會比赤裸裸的資產階級統治更可愛，因為人民群眾對他們而言，同樣都是“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同樣都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

回社會民主改造

終於把要說的話說完了。

這些文字的用意不在於說念祖兄的文章是錯誤的。在連戰的“資產階級內閣”上台後，新K動作頗仍讓人的確眼花撩亂。在這個時刻，“反李”的提出，的確是發人深省的課題。然而三年以來的“反郝”運動並不應該因為郝柏村的下台而結束。如果“反郝”能夠代表上一個階段反威權官僚政體的一個說明，那麼這樣的運動今天仍應該持續下去，僅管可能反的是新K，或其它什麼牛頭馬面，或者和藹親切如王建煊這般的角色。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選擇李登輝。反對黨已大到佔有國會三成以上的席位，這裏面鬥爭的空間還不小。當然反對黨並不代表人民、運動、草根組織還是社會改造者最應投注心力的地方，也是人民最後的憑據。

再重覆一次：社會改造與民主改造並行！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註1> 這當然是念祖兄的意見，而不是李登輝的想法。但是李登輝應該是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才符合他只是拿小地主、農民與擁有祖產者來“掩飾”其作為大地主資本代理人的面貌。

<註2> 我這裏的推論大膽了一點。

事實上念祖兄並未明說製造業的“進步性”。

可是從前後文的脈絡看來，徹底的土地改革“除了土地稅制的變革之外，還應該包括土地利用、國土規劃政策的改變，甚至包括土地所有權的轉移。換句話說，應該是將多餘的、非生產性質的土地自私人手中釋放出來，並透過國家政策進行土地所有權的再分配。”如果這樣，王的方案為什麼較具進步性？又為什麼製造業的利益在這件事情上該擁王？顯然念祖兄認為製造業比起土地資本來說是在從事生產，而這符合土地改革的部分要件。以是我便說在念祖兄心中其實製造業也是相對於土地資本較具“進步性”的，起碼在對於土地利用的這一點上。Ⓟ

編輯手

這一期基本上是野百合學運專輯。

我們邀請三年前參與決策的朋友以當事人的立場回顧那場在中正廟的學生運動。大家先是對如何討論提出不同看法，不過也同時拋出許多觀點和意見。其間不乏對運動的質疑和檢討，以及對台灣這三年的發展丟出一些觀察。三年前這群朋友在廣場上和台灣統治階級過了招，不論當時對運動的分析及理解是否粗糙，抗爭手法是否拙劣，三年後這群朋友仍然在不同的領域中持續戰鬥著。

「學運討論」則是一群朋友以運動參與者立場自我反省所做的努力，希望後續的討論能陸續和讀者見面。

與三月學運息息相關的是同年及91年5月的兩次反郝，而今年郝柏村下台，資本家集團的嫡長子連戰組閣，反映著台灣另一個歷史進程的開始。而爭權失利的新國民黨連線仍運用舊的封建的政治語言，如反台獨、孫文主義四處招搖撞騙，另一方面李登輝的「意志」似乎得到全面的展現，帶領台灣走向不可測知的未來。「1993年3月政經筆記」企圖以提綱契領的方式對這些情形做一分析，「有人問我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則試圖就第一期侯念祖的文章做出發，以土地改革為例，揭露出非主流派或新K以虛假的社會正義，欺瞞中下階層的把戲。

「校園運動長期經營的另一種思考」是由在校學運幹部合作的，在裏面我們可以觀察到學運幹部思考如何和群眾結合的一些出發點，是篇在實踐過程中有肉有血的文字。

有心的讀者應該可以看，這期在表面多樣甚至有些歧異的辯證之後仍透露出野百合編輯們終極的關懷：學生運動與台灣局勢。所以，這一期有很大篇幅報導了現在校園的動態，這才是活生生的台灣學運。

我們都知道獅子比馴獅人有力，我們知道，馴獅人知道，但是獅子不知道，希望野百合通訊的出刊能有助於獅子的覺醒。

記

感謝下列朋友給予我們人力及經濟上的支持：
林水龍、林家瑋、趙文聖、梁偉華、徐永偉、李儒卿、王世全、游正名、王浩威、蔡榮裕、姚昇志、王正海、林明定、潘建志、許益智、張廖萬堅……
以及各校園內持續抗爭的學運幹部們